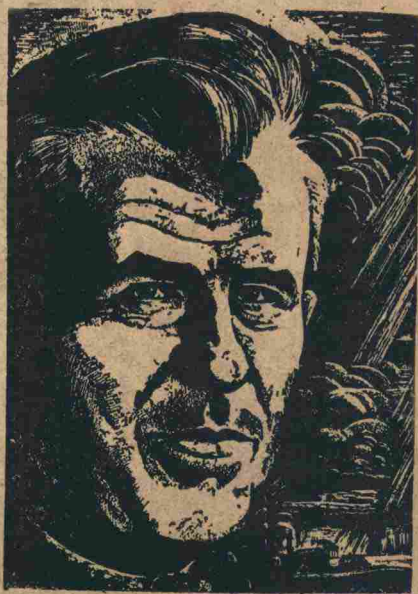


華萊士與第三黨

譯編東植・松慕

版出圖書林綠



# 華萊士與第三黨

編譯者：慕松·植東

綠林喜園出版

一九四八年六月

# 黨三第與士萊華

---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版

基本定價七元

編譯者

慕植

松東

出版者

綠林書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3000)

# 目次

## 一

華萊士與第三黨.....慕松 一

——格倫·泰勒.....三五

## 二

我爲什麼競選總統.....三七

第三黨與美國傳統.....五三

我的世界復興計劃.....六五

兩黨聯合與兩國聯合.....七二

美國的軍國主義.....七六

論塔虎特.....八三

人民說話了.....八九

三

「新共和」與第三黨.....	史却萊德	九五
華萊士：政治家？預言家？.....	克却威	一〇一
競選與冷戰.....	勒納	一〇七

後記.....		一一三
---------	--	-----

# 華萊士與第三黨

—

「我們現在要作歷史上重大的選擇。

這非但是人民政府和獨裁政府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自由和奴役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前進和後退之間的選擇；

這是把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選擇。」

—— F D · 羅斯福

美國人民正在面對着一次歷史性的危機，遠較他們的祖父輩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間所面對的危機要嚴重得多。

八十幾年前，美國的反動勢力團結在奴隸領有者的後面，公然把寡頭統治建立在奴隸制度上，向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挑戰；而今天，美國的反動勢力都在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之下集合起來，它們

居然把奴役全世界的妄想寫在對外擴張的旗幟上。獨佔資本家的對外擴張與對內剝削是相輔為用的；因此，美國反動勢力的政策，在國內必然形成恐怖和蕭條，在國外必然製造仇恨和戰爭。在這個嚴重的危機中，美國人民的自由與生存也就臨到了一髮千鈞的關口。

在今天，要自由與生存就要抗爭。覺醒的人民便決心用行動來克服當前的危機。眼前是美國的新與舊、進步與反動搏鬥交戰的時刻，一個巨大的鬥爭正在成長中，這就是以華萊士為前導的人民力量與以華爾街為核心的保守勢力之間的鬥爭。第三黨這個應運而生的政治組織，毫無疑問的，將在美國政治生活裏產生重大的影響。

我們絕不應該用市儈的眼光來看華萊士與第三黨，他們即使在今年大選裏輸了一個回合，也絕不等於輸掉了戰鬥。不管它今天的力量如何，它的產生當然是美國近代政治史上頭等重要的事件。它的要求，並非譏嘲與辱罵所能擊退；它的作用，亦非侮蔑與封鎖所能消除。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運動，在各方面都不以今天為限；它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結合，在今後能够凝固美國四分五裂的勞工團體和無家可歸的自由主義者們，農夫，黑人，以及獨立和進步的選民。

當然，這也是應該指出的，華萊士和第三黨的運動，在基本性質上，首先是美國民主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在今天，要打倒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得把有組織的勞工作為建立進步政黨的基礎，同時在這周圍把那些認識放棄羅斯福政策的危機的人士團結起來，而且，還得付出比南北戰爭時代打倒南部貴族寡頭統治更大的代價。再者，勞工們必須認識他們在巨大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保衛

民主與和平的歷史意義，要能像當年支持林肯總統對抗南部貴族的反勞工十字軍一樣，更英勇更堅決地支持與鞏固華萊士的運動，促進美國民主生活的發展。

這就是美國當前政治情況的基本態勢，也是孕育美國偉大前途的母胎。

二

「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是華爾街的政黨。」

——E·丹尼斯

「美國的報紙時常說兩個異黨之存在是真正民主的保障。可是我們却可以注意到沒有一個人能解釋清楚這兩個異黨的觀念上的分界線究竟在何處，而北部的共和黨與南部的民主黨究竟有何不同。」

——I·愛倫堡

華萊士帶給美國人民一個戰鬥的號召。第三黨的出現則提供一個新的決擇的機會。任何公正的觀察家都會誠懇地肯定它的政治價值。因為美國現有的政黨都靠不住，驢羣（民主黨）與象羣（共和黨）其實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這種說法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當然不會否認美國民主黨里（共和黨里也是一樣）有不少具有自由信念的進步人士，正英勇



地爲保衛羅斯福的理想而奮鬥。我們當然也不會忽視裴柏、泰勒、摩斯等人及其他正直的議員們，因爲他們決不肯從兩黨領袖的反動政策，還能在議會反動派席次的包圍中看清楚人民大眾的利益。不過，我們更知道今天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策在事實上實在很少分別，而這些代表大獨佔資本家利益的兩黨總統候選人也決不會相差很遠。

許多年來，美國政黨在思想與政策上的差別早已不很明顯，一般人很不容易從原則上來區分各黨的立場。是的，共和黨是非常保守的。它是胡佛、杜邦、赫斯特、麥考密克之流的政黨。不錯，決定共和黨政策的幾個主要人物正是美國大獨佔企業的代表。概括地說來，共和黨反對政府管制經濟生活，鼓吹所謂「自由經濟」，而且我們相信，如果共和黨執政的話，任何新政的措施和進步的法案都不能出現。但嚴格地說來，假如把共和黨指爲一個保守反動的政黨，却絕不能把民主黨對稱爲一個人民的政黨。它基本上是杜魯門、福萊斯特、蘭金、貝爾納斯之流的政黨。

「共和黨和民主黨」，歐金·丹尼斯說：「都是華爾街的政黨——代表不同的、但通過連鎖性的董事會議相互勾結的派別勢力與獨佔集團。因此，他們的帝國主義目的是共同一致的。」

但是，這也不是說華爾街的兩個政黨的意見完全一致，彼此團結無間。事實不是這樣；美國反動派內部的差別乃至矛盾仍是存在的，反動派內部的統一戰線並不穩固。然而，我們必須分別清楚這些差別和矛盾並不完全以兩黨的差別與矛盾來表現的，實在的矛盾存在於大獨佔資本集團之間。所謂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立，所謂民主黨政府與共和黨國會的對立，只是這些矛盾的表象而已。本質的說

來，兩黨之間及其內部所表現的各種矛盾，除了黨派之爭而外，主要的矛盾是存在於怎樣才能順利地推行大獨佔資本家的政策，選擇什麼方法和採取什麼步驟。雖然這些矛盾和資本家集團內的矛盾，在某一個時期內是重要的，而且可以為進步陣營利用來加強自身的力量，但這些矛盾不是本質的矛盾，而只是杜魯門、范登堡、馬歇爾、杜爾斯、胡佛、塔虎脫之間的所謂兩黨政策的內在矛盾。它絕不能用在原則上區分兩黨的。

我們還得更進一步分析美國的兩黨。

美國政治實際上並不受民意支配，而決定於民主共和兩黨；這兩黨却又受着大獨佔資本家集團的支配。美國大獨佔資本家集團是同時對兩黨投資的，不論誰上台都必須為華爾街忠誠服務。這也就是說，美國的政黨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共和黨是保守份子；而在民主黨的核心地帶——南部各州，除去少數的例外以外，南部民主黨大多數至少也像共和黨一樣的保守。南部民主黨也許偶然推出一位像阿爾巴爾州參議員希爾或佛羅里達州參議員裴柏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但一般地，南部民主黨人對民主進步的政策根本毫無熱忱。

兩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少數黨棍 (Party Boss) 所操縱的機關 (Party machine)，用來做政治交易的工具罷了。拉斯基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民族」雜誌上發表的著名的政治論文里說：「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明白：美國的政黨並不是一種促進思想的組織，而僅是一種鬆懈的黨機關的聯合體。它的目的只是要獲得足夠的選票使政黨成為它們玩弄的工具。進步思想只當能為它們增加

選票時才使它們覺得有些價值。」這話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深知羅斯福的政策在大體上是與民主黨機關的要求相背的，他以競選勝利來換得黨機關接受他的政策。人們所以誤認民主黨為進步的政黨，那只是由於過去十二年間羅斯福總統對於民主政治的熱忱和接受進步羣衆的支持，才給民主黨加上了特別的氣質。羅斯福時代結束以後，凡是正視美國政局的觀察家，不必等到共和黨人在前次國會議員改選中大獲勝利，就知道美國政治已經回到了反動的時代。

這里介紹一則饒有趣味的故事。阿道爾夫·A·貝里是故羅斯福總統的機要顧問和擁護新政的知名民主黨員。現在他已脫離民主黨。他曾在“47” the magazine of the Year 上這樣寫道：

「民主黨里的一位知名人物有一次派一個專使來見我，要我寫幾篇演講稿，以便幫助他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中獲勝。我就問那專使，那位政治家究竟準備擁護什麼政策。他的專使答道：那是你的事呀。你認為什麼政策能幫助他獲勝，便把那些政策寫進去好啦。」

「那位專使當然不覺得他的話有什麼可奇之處，……在他和他的同伴看來，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在他看來，民主黨的存在，只是要把一批人捧到公事房里去，並使他們長留在那兒。」

這一席話很生動地證實了拉斯基的判斷，美國的政黨是選票的掮客而不是思想的經紀人。目前的政黨制度不僅不能適當地對付當前美國的問題，而且使美國民主政治在惡濁的氣氛中日益枯萎腐爛。因為它們只要求一個因循守舊的政府，使大企業在市場上稱心快意，使政客們在官場上地位穩固，也

就使選民在黨棍巧妙地操縱下把票送給特定的候選人。所以，美國現存兩黨都是腐化而反動的政黨，它們已經傷害了美國政治民主的活力！

舉一個例：

如所週知，美國有種種非法方法取得選票的「攪票機關」。Richard J. Wilson 在“Look”上曾經指出，杜魯門就公開鼓勵培育班達蓋斯脫攪票機關（Pendergast Vote Getting machine）。這個選票操縱機關設在杜魯門的故鄉米蘇里州。廿五年來，它的鐵腕緊緊地控制着康薩斯城和傑克森區。杜魯門便是這個機關一手提拔出來的。過去的主持人是湯姆·班達蓋斯脫，他的勢力遍及米蘇里全州，並與民主黨全國大會主席漢尼根的聖魯易攪票機關取得連繫。在一九三八年秋季選舉中，在一州的全部選票中竟發現六萬張「鬼票」，其中有些根本並無此人；有些早已死掉，從攻慕里投來的。現在的主持人是湯姆的姪兒詹姆·班達蓋斯脫，他是傑克遜民主黨俱樂部的主席。在一九四六年秋季選舉中，他們全力阻止 R. S. 史洛脫重新當選為衆院議員，因為他常常抨擊杜魯門政策，結果就選出了杜魯門支持的 E. 阿克斯德爾來。這個例子無情地暴露了美國政黨的腐敗，美國精神的危機！

由上看來，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目前美國人民必須試試別種政治組織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過是一邱之貉，現在需要着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組織來滿足人民大眾的要求，提供新的選擇機會！時局需要第三黨出現，這是美國現實政治的必然趨勢。

## 三

「第三黨無論如何在美國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極端主要的成份，而且沒有它，美國將永遠地處於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

——H·華萊士

華萊士於此時領導第三黨登場，來得正合當前形勢的需要。華萊士遊歐歸國後曾經說過：「假如民主黨不能成一個自由的政黨的話，那就必須採取某種行動。美國的前進的人們遲早總得要有一個政治機構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假如兩黨都是保守的話，那就絕對需要一個新的政黨」。現在這個「假如」已不存在，當前兩黨不僅保守，而且腐化反動。當兩黨倒行逆施，新的經濟風暴又將到來的時候，華萊士的決定領導第三黨從事競選的意義，其重要性不下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羅斯福從紐約趕到芝加哥接受總統提名。

可是美國有不少人常常以為第三黨的組織是違反美國政治的歷史傳統。他們的理由是，第三黨的出現意味着多黨制度的肇始，結果必將產生像歐洲許多政府所造成的紊亂。其實這些人既不認識現實，也不瞭解歷史。在現實的環境中，誠如華萊士所說：「第三黨無論如何在美國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極端主要的成份，而且沒有它美國將永遠地處於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在歷史的記載里，試看一百五十年以來，美國的進步措施都是由新黨帶來的。這些新黨大部份是在戰爭之後經濟動盪的局面中興

起的。他們提出許多新的建議，以後相繼被制訂成法律，雖然控制舊黨的既得利益集團仍然用盡力量去破壞他們的存在。倘要開闢美國政治的新路，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組織新黨。

第三黨運動並非美國歷史上的新問題，也不是從一九二四年大選以後開始的。探本溯源，今天第三黨運動有它自己的歷史傳統。

回顧史乘，自從民主與共和黨相繼定型以後，近百餘年來，美國人民事實上並沒有承認這兩黨能够代表他們各階層的社會利益和要求。遠在一八一二年戰爭和幾次拿破倫戰爭以後，美國的勞工便從政治上抬頭。他們曾經是民主黨傑克遜派的主要支持者，那是在傑克遜推毀了合衆國銀行與推翻了東部財政和專實權力的時候。後來發覺民主黨中的保守份子太多，他們又在平權黨的旗幟下攻擊輾斷，主張提高工資。一八三六年以後，民主黨在奴隸和勞工問題上顯著地表現了反動態度，因此勞工們支持的、以林肯爲第一任總統的共和黨出現了。林肯死後，共和黨在長久期間中並不接近人民，而且幹了許多可厭的事，於是第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農業促進會」在一八六七年成立了，代表農場主反對鐵路，托辣斯，抵押公司和壟客的剝削。一八七五年出現「綠背黨」，反對執政的共和黨，主張政治組織必須爲民有、民治、民享，盡力遏制大資本侵害人民的權益。一八九〇年平民黨成立，它包括了南部和西部的農民，也包括「勞工武士會」與工會團體，及一八八八年成立的「聯邦勞工黨」的成員。在這一世紀末葉，平民黨革命橫掃草原和植棉區域，表現了美國政治上從未見過的跡象，在美國政黨史上寫下了最有聲有色的一頁。他們堅決反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華爾街的統治份子。偉大的

女宗教家瑪麗·索斯說道：「這已經不單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治，華爾街所享的了。」平民黨可以說是美國許多進步理想的搖籃之一，它們的主張在後來羅斯福的建樹中發揚光大起來。以後陸續出現了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人民陣營中出現新軍：就是美國共產黨。

到本世紀初葉，第三黨更成了美國政治上重要的課題。在共和黨推荐資本家的代理人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和民主黨推荐華爾街大亨摩根的代言人戴維斯 (John W. Davis) 競選的時候，美國人民就和今天一樣明白他們應該有新的選擇和自己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就發生第三黨運動，推選拉福勒特 (Robert La Follette) 做總統候選人。雖然第三黨並沒有得到够多的選票，但是它在民主共和兩黨暗黑的天地中高擎着前進的火炬，照耀出美國今後應有的政治前途。拉福勒特所訂的原則在今天還有價值：「……我們都不信兩黨會遵守他們的諾言。兩黨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對於他們的政綱，正和今天一樣，並不看作是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和行動的方案；而是用作攫取選票和官職的手段，並給予背叛大眾信任的人許多增進私益的機會。所以打破私人獨佔資本對於美國人民政治經濟生活的聯合控制，是一九二四年運動最主要的論題。」引用萊士的話說：在一九三二年為羅斯福工作的數百位新政人士就是一九二四年的進步主義者，而且倘若沒有拉氏當時的勢力，那麼九年後羅斯福新政一定是缺乏力量的。

這就是今天萊士第三黨的歷史傳統。它是一個源遠流長的運動，不過現在比往日任何時期都要

高漲。

今天的第三黨也有與二十四年前不同的地方。如果它和過去一模一樣，重複過去的形態和策略，也必將重複過去的失敗。

首先，二十四年前第三黨運動之所以發生，完全由於國內問題的刺激。受第一次大戰後獨佔資本家們剝削的小資產者羣，尤其是大部份農民們，都擁戴共和黨內拉福勒特領導的反對派。同時，受破壞罷工政策打擊而失敗的工人們，也來支持第三黨運動。但是那時候勞工們力量薄弱，第三黨領導權和主動性握在中產階級的手裏，只促成了第三黨候選人的提名，而沒有造成第三黨廣大的基礎和展開澎湃而持久的運動，所以在選舉以後就立即被解散了。另一方面，那個運動剛發生在「柯立芝繁榮」的時候，資本主義在戰後有了相對的穩定，迷亂了羣衆的意念，鬆懈了人民的努力。而今天，美國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它黃金時代的盡頭，美帝國主義登場邁了一步。在國外，它不能再像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那樣如意地建立金元帝國，在國內，新的經濟風暴的信號已經出現了。華爾街獨佔資本家的咆哮暴跳，正是它色厲內荏心知不祥的表現。相對的，第三黨運動在農民、中產階級、黑人、以及一般信守羅斯福政策者中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而它主要的基礎必須也正是勞工階級，雖然表示擁護第三黨候選人的還只是少數賢明的工會領袖。今天已經具備了成立人民政黨的條件，不只是提出一個候選人而已。

其次，就產生的經過來說，它是新政系的一個重要分支。以羅斯福爲中心的新政系聯合戰線是在



一片嗚咽中解體的。從前年十一月選舉之後便形成兩大組織：大部份上層領袖如羅斯福夫人，前物價管制局長包爾斯 (Chester Bowles)，前房屋管理局長韓德遜 (Leon Henderson)，魏亞特 (Wilson Wyatt) 等，以原有的聯合民主行動會 (United Democratic Action) 為基礎，成立了美國民主行動會 (Americans Democratic Action)，而另外兩個推動一九四四年選舉羅斯福運動的團體，全國公民政治行動會與獨立公民委員會合併，成立了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以華萊士，前紐約市長及聯總署長埃加第亞及自由主義政論家金頓 (Frank Kingdom) 為領袖。這兩派的分岐是由於對共產主義所持的立場不同而起。民主行動會向反動勢力退讓，接受反蘇反共著名的杜賓斯基 (Daird Dubinsky) 等右派勞工領袖的支持；同時在美國政策中最重要問題上，保持所謂「中間」的立場，他們認為民主黨和杜魯門並非不可救藥，也不是和共和黨同樣代表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的集團。因此，他們不贊成採取行動，為美國政治打開新的境界，而只是用批評和建議來影響民主黨向左邊走而已。進步公民協會則是一個行動的團體，他們高舉起進步的旗幟，拒絕成為美國反動勢力瘋狂反蘇反共的俘虜。並且看透了民主黨與杜魯門的本質，逐步擴大政治活動的範圍。他們認為爭取民主黨向左走已不可能，美國人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第三黨。兩年來經濟政治局勢的敗壞，刺激了它們的發展，雖然沒有上層份子的支持，但他們的下層基礎却日益廣大了。華萊士的第三黨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

美國第三黨繼承了歷史進步運動的優良傳統，又接受這兩年來進步份子的鬥爭經驗，配合當前的形勢，適應大眾的要求。華萊士已經明白宣布組織新黨，並為今年總統候選人，給美國人民一個新的

選擇。

#### 四

「我不相信美國的自由主義者能够利用目前的政黨制度來繼續履行他們的主張。」

— H. J. 拉斯基

華萊士的決定組織新黨，競選總統，使得不少自由主義者和他決裂。就像華萊士自己所曉得的那樣，許多胆怯懦弱而目光近視的自由主義者離開第三黨運動而他去了。

我們不能否認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價值，他們是中產階級的花朵。同時，美國的社會基礎確也固定了自由主義者的進一步發展。首先，他們在人生態度上是個人主義者。他們拒絕組織，排斥集體行動，完全信賴個人言論在政治上的影響，可是今天的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勾結好戰軍人與專門攪亂是非的外交家們把持了政權機構，睥睨當世，飛揚跋扈，個人的、零散的、微弱的言論批評，對於牠們只是過耳春風，那裏能够放在心上，更談不上能够發生什麼足以改變他們行動的影響。自由主義者今天竟還保持往昔的作風而不改。嚴正地說，發表一些枝節片斷的批評，只是個人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根本無補於受害的大眾；拒絕有組織的共同行動，沖淡了羣衆反抗的意志，阻礙了人民向他們的正確前途邁進。在客觀上若不指出他們已經墮落到共同犯的地位，最起碼也表現自由主義者的卑怯懦弱，

自私自利。曾經在歷史上不倦地支持進步運動的自由主義者，到今天已經在嚴格的致驗中可悲地墮落了。

其次，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看法上是孤立主義者。在他們的記憶里，內政問題一向是美國政治上爭執的焦點。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視野從來沒有越過兩洋而遠瞻全球。戰爭把美國的世界地位提高了，目下儼然就是「美國世紀」。歷史如此激變，向來眼朝內看的自由主義者來不及掉轉他的視線。眼前一片紊亂與叫囂，充斥的是蘇聯侵略、共產黨獨裁的傳說，反蘇反共是美國到處可見的歇斯的里病。不反蘇不反共者，就有被老闊們、主官們撤職的危險。自由主義者在重大關頭往往以個人的地位、名譽和幸福為最後決定的基準，雖然歷史上不乏勇敢獨立、不同世俗的鬥士，而今天却並非都是如此。這就說明了像金敦和華爾綏(Raymond Walsh)這樣進步的無綫電廣播家，他們曾經竭力鼓吹擁護華萊士，組織第三黨，但在華萊士決心組黨的時候，為什麼竟臨陣脫逃。

這些「自由份子」的行徑，說明了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墮落的危機中。他們中間不乏學識淵博、人品優異之士，然而對於整個「自由份子」墮落的傾向，並無幫助。在表面上看，他們和華萊士運動之間主要的分歧，在於對蘇對共的態度，實際上這只是浮面的區別。責備蘇聯擴張的美國人，先得看看自己的手是否潔淨；申斥共黨實行所謂極權統治的美國人，應該記得他們自己的獨立宣言。放眼世界，有金元所到之處就有紊亂與戰爭。回顧美國，好戰的歇斯的里病在蔓延擴大；反美活動調查會濫用國會調查權，侵害人權；種族歧視，黑人遭殃；輿論與論，禁閱進步書刊；美國不美，未有如今日

之甚！所以反蘇反共實際上不過是今天美國統治集團反民主反人民的藉口！由於美國自由主義者對當前統治集團的本質認識不清，特別是對民主黨和杜魯門政府還有若干幻想。所以他們與華萊士的進步運動告別，甚至妨礙它的展開。

問題就在這裏。

我們還是舉例來說：反對第三黨運動的美國自由主義者，可以民族雜誌編者克却威（Freda Kirchway）和上午報總主筆勒納（Max Lerner）兩人的意見為代表。他們都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佼佼者。克却威認為華萊士宣布參加競選，在策略上言是不智的，他很可能把反動的共和黨人送進白宮；勒納斷言華萊士的提名將造成否定結果，因為他本人並不能獲得足夠的票數，徒使那些比極端反動者為優的民主黨候選人失去許多選票。這就是自由主義者們反華萊士運動的有力論點。

事實不然。自由主義者們無疑地認為民主黨比共和黨為佳，兩害相權取其輕，照克却威們的意見，似乎在策略上是聰明的了。但是問題在於：民主黨和杜魯門政府是不是為害較輕呢？

還是以最雄辯的事實來回答善辯的自由主義者們吧。我們已經指出，民主黨與共和黨只是一丘之貉，他們都是華爾街的政黨。自由主義者們的錯誤就在仍寄希望於民主黨和杜魯門政府，也就是對於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還存在着若干幻想呢！這些人們中，美亞雜誌編者傑斐（Philip Jaffe）的意見是個範例。傑斐是優秀的進步的自由主義者。他在美亞雜誌的終刊號中發表了「美國：机樞不安的勝利者」（America: The Uneasy Victor）一文，對杜魯門主義作全面的有系統的分析研究。他所提出的

目標是和所有美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及真正的進步主義相符合，但他所提出用以實現這些目標的策略，卻與白勞德主義(Browderism)並無一致。他對華爾街及其第二個走卒民主黨與杜魯門政府存在着很大的幻想，認為美國反動集團在最近的局勢能够採取進步政策的，不過他加上一個按語，因為美國人民需要進步外交政策。他說：

「……杜魯門主義並不是代表一個堅定的不可動搖的政策，它祇是個基於對世界的虛妄的瞭解，在匆遽草率中臨時訂成的方案。事實上，美帝國主義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政策。她祇有為一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不變的「目的」，就是有利地輸出商品與資本；至於達成這個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政策」，卻還在徬徨與實驗的過程中。」

「如果美國人民能成功地促使外交政策回復了民主的道路，那他們將面對另一個事實，即美國的資本主義將藉此得到一個全面的繁榮時期。在這時期中，獨佔資本家將贏得巨額的利潤，甚至還能發展他們的活動範圍。……大企業是必得為這一長期繁榮付出其應付的代價，並通過下列方式而屈服於大眾福利之前，諸如計劃生產，高額賦稅，普遍提高生活水準，增進社會安全，保障人權等等。美國人民能促使獨佔資本家為千百萬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成功，將不僅為持久和平鋪平了坦途，且更能為一個繁榮的世界及富有的美國鋪平了大道。」

這個想法是天真美麗的，但美國自由主義者們並沒有認清獨佔資本家及其走卒的猙獰面目。杜魯門主義實際上就是從最大的獨佔資本家的強硬綱領中產生出來的，與胡佛、范登堡、杜爾斯及其他反

動的政客們思想都是一母所生；它也是民主黨有系統地背棄一九四四年競選政綱的邏輯結果。對外看來，美國的獨佔資本希望靠它來嚇倒較弱的國家，使它們完全依賴美國，而實現華爾街統治世界的霸圖。對內看來，國內目標是和國外目標一致的。杜魯門主義企望加強總統本身在大資產階級行列里的地位，從而在民主黨內繼續獲得候選人資格。獨佔資本家製造這一支「反共」十字軍，來剝奪工人運動的戰鬥力，孤立共產黨人和一般左派進步人士，以便削弱進步人民的政治影響。可知美國資本主義絕不異於別處的資本主義，它既不能克服其內部的經濟與政治矛盾，更不能仁慈地爲「千百萬人民的利益而服務」。這兩三年來，羅斯福式的改良政策被砍伐得體無完膚的事實，難道還不够驚醒進步自由主義者們的美夢麼？

所以美國人民不能再對民主黨及杜魯門政府保有幻想。誠然，在過去五十年內，民主黨曾兩次動員了全國進步思想和自由主義者，共和黨則自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以來就根本不會有過這種嘗試。在今年，兩大政黨及其有關係的獨佔集團會採取彼此不同的策略，但無論那一黨或那一個總統候選人的勝利，都不是人民的勝利。民主黨已與共和黨同流合污地執行大獨佔資本家的反動政策：在外交方面，這兩黨都是擁護和執行統治世界、準備戰爭、支持全世界反動份子以及重建德日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兩黨都支持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兩黨都採取行動破壞聯合國機構，都企圖干涉東歐國家的內政；在國內，杜魯門政府和共和黨對於反勞工的反動政策，應負同等罪責。杜魯門破壞罷工的罪過，不下於共和黨的反動份子的行爲，兩黨都在執行全國軍國主義的計劃，破壞人權自由

。嚴肅的政治觀察家不能不承認，民主黨和杜魯門政府實在是美國法西斯化的橋樑，正如布朗寧政府對於德國一樣。牠是美國的希特勒的開路先鋒。那末，試問民主黨（杜魯門等人在內）的勝利那里是「爲害較輕」呢！

至於說到華萊士削弱了較好的民主黨候選人的選票，也是不明事實的論調。我們說過，即令沒有新黨出現，誰能担保民主黨與杜魯門重行當選會比塔虎脫、范登堡、杜威、史塔森的共和黨能給美國人民一個不同的對內對外政策呢？再者，根據一八六〇年內戰以來的民主黨歷史觀察，杜魯門的運氣決不會太好。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民主黨只選出了四任總統：克利夫蘭兩次，威爾遜兩次，一八八四和一九一六的兩次勝利，都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克利夫蘭戰勝哈利遜的一次大勝，但雙方票數仍然相當接近。這一段歷史告訴我們，只要民主黨以南部爲基地，以保守主義爲基調，只要西北兩部選民不因經濟上某些原因而改變政治路線的話，民主黨照例是競爭不過共和黨的。只有在經濟大恐慌把千百萬人民帶入苦境，而羅斯福總統却能抓住人民要求、把他們領導起來的時候，民主黨才第一次取得了壓倒的勝利。像杜魯門這種小角色，再加上放棄了羅斯福路線，即使動員全部自由主義者來爲他搖旗吶喊，也是很難勝利的，更何況全部動員自由主義者來支持杜魯門這樣的候選人就不可能。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副主席鮑杜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報」上對於勒納的反對有所答覆，他說：

「在城多城市里，我看見了華萊士在工廠大門口的羣衆集會上發表演說，或和當地職工會

代表舉行非正式的會議，我必須指出，如果你們低估了美國普通工人代表對華萊士的感情，那你就造成了一個極大的政治的錯誤。……美國進步公民協會認為，華萊士的提名競選，將造成了廣大選民參加一九四八年選舉所必需的刺激。沒有它，進步候選人將遭受失敗。」

總結一下：美國政治局勢如此緊急，如果認為華萊士的競選在策略上是錯誤的，那無異於認為美國人民只有屈服在獨佔資本家的兩個政黨的政策的之下才是「正確」的。如果藉口老羅斯福在第一次大戰前夕所領導的共和黨分裂運動給威爾遜遜造機會的教訓，來批評華萊士拆民主黨的台，那無異於以歷史古董來阻擋人民的進路，在效果上是絞殺人民進步運動。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明白：在兩黨統治集團的眼中，自由主義的國會或自由主義的總統都是客串性質，美國目前的兩黨制度所抱的目標與他們不同。擺在美國政治日程上的問題，不是能否重選一個比共和黨稍好一籌的杜魯門或其他民主黨候選人的問題，而是能否組織一個新黨，在第一次競選中不一定勝利，並有可能在一九五二年完成最高任務。這樣一個人民運動於提出自己的國會候選人之餘，還可以增加兩個老黨里的進步份子的聲勢與力量。

現在是美國自由主義者擺脫對民主黨與杜魯門輩的幻想而覺悟的時候了。



## 五

「華萊士的競選並非單單與美國進步公民協會有關。它不過是擁護華萊士的許多組織之一。所有這些組織都應該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人民的政治機構。這樣，我們就能防止不景氣和戰爭，並且使全世界人民知道，有千萬的美國人，他們都不要戰爭，有這樣的美國，它重新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進步公民」月刊

## 「一九四八華萊士！」

這是震動美國兩黨領導機構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鼓勵下，美國民主進步人士的團結正積極地展開，華萊士就成爲一切愛好和平反對戰爭、主張民主反對獨裁、要求生存反對剝削的人民的旗幟。

華萊士是個高瞻遠矚勇敢無匹的領袖。若祇稱他爲「預言家」而不是「政治家」（克却威語），那是抹煞他這兩年在羣衆中間發生的巨大影響。他和他的同道，絕不沾沾自喜於發表言論，而能積極行動起來。美國人民實在被他底明確的見解、堅定的信心和一往直前的戰鬥精神所鼓舞起來了。

去年四五月之交，華萊士從歐洲呼籲和平歸來，在國內進行巡迴演講。憑着銳利的辭鋒，感人的態度，和爲民主和平獻身的虔誠，他簡直把美國政治生活的基層全部撼動了，而爲廣泛地美國人民所

注意。據一統計，他在兩月內曾作四十次演講，面對二十萬以上聽衆，以無線電收聽者達數百萬人。根據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估計，華萊士所收的門票和捐款總數在百萬元以上。從數字就可看出華萊士的政治影響如何巨大了。甚至連絕不同情民主運動的阿索普 (J. and S. Alsop) 早就認爲第三黨的形成已經變成一種現實的可能了。這個運動超越宣傳階段而進入了組織階段。華萊士已經不只是會發議論的預言家，而且是日漸成長爲具有羣衆影響的政治家。

華萊士愈堅定，第三黨運動愈能展開。到現在，華萊士的競選運動並非單單與美國進步公民協會有關。它不過是擁護華萊士的許多組織之一。

從政治區域來講：加利福尼亞州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了獨立進步黨，明白標示擁護華萊士競選總統。加利福尼亞是個政治成年的一州，一向反對杜魯門政策與共和黨國會領袖最烈的地方，有四十六萬人簽名支持華萊士（有選舉權的每六人中就有一個簽名），自非奇事。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對第三黨和華萊士的支持，譬如伊里諾州和俄亥俄州，近年來都是共和黨佔壓倒優勢的中心，但在伊里諾州已經有一個反對兩大舊黨的進步黨，且在去年十一月芝加哥市選中擊敗了兩大舊黨。俄亥俄州進步公民協會會員有五千人，依靠這個核心來組織第三黨是不成問題的。再朝遠看，西北部也是一片有希望的土地，如明尼蘇達州，北達科塔州，威斯康辛州，蒙且那州，第三黨和華萊士必將得到很大的支持。特別是在北達科塔州和蒙且那州，美國進步農民組織——農民組合 (Farmer's Union) 基礎鞏固而廣大，是這兩州最有力的人民團體，它們一向擁護華萊士的。因爲在這些州內，農民們辛苦開拓所

得的財富被金融資本家們狼吞虎噬地吃光了。他如在賓夕法尼亞州已成立擁護華萊士的委員會，新澤西州獨立公民同盟也一致表示擁護華萊士。在紐約州成千累萬的美國勞工黨選民，都熱烈地擁護華萊士為第三黨候選人。今年二月下旬紐約布朗克斯區衆議員補選，民主黨老闖弗林所選定的候選人吃癩，支持華萊士的勞工黨候選人L·伊薩克森大勝。這個勝利雄辯地說明了獨立進步黨是有前途有希望的。

從黨派現況來看：我們說過，紐約勞工黨是支持華萊士的。美國共產黨一向是在努力擴展羣衆民主鬥爭的作用，而主張進行獨立的競選運動。說共產黨是華萊士和第三黨的牽線人，那是一種污蔑；它是有力的倡導者與贊助者則是事實。第三黨不會是只代表勞工階級的單一政黨、人民所需要的是勞工、中小資產階級進步份子與共產黨的聯合行動。此外值得重視的是民主黨。民主黨內擁護華萊士的共有兩派，一派以B·肯尼爲代表，一派以故羅斯福總統的長子詹姆士·羅斯福爲代表。肯尼願意在任何情形下擁護華萊士。去年華萊士巡迴全國以後，杜魯門民主黨人與華萊士民主黨人之間的差異就很明顯了。在第三黨尚在傳聞的時期，據一次蓋洛浦民意測驗，八票中除去態度未定者外，有一對六的比數擁護華萊士，這表示民主黨中已有不容忽視的少數派願意支持羅斯福的第三黨了。目前民主黨處於毀滅的危機中，在內部，黨機關與小黨員的要求距離越來越大，在外部，它受着共和黨的嚴重威脅。這形勢有利於華萊士運動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將使南部形勢大爲改觀。據保守的「世界報告」雜誌透露，南部有力的民主黨員計劃與共和黨保守份子聯合，選舉共和黨總統，以壓制左傾，這消息

鐵一般地表示美國兩黨都是一樣東西！事實上，近年來南部民主黨內部會有過重大的、雖然是極端似的斷續的進步份子的叛變。在擁護華萊士的鬥爭裏，這些叛變將在南部民主黨根據地展開，變成一個有組織的運動。至於共和黨呢，共和黨在一九四六年所獲得的聲勢已經衰退了。它在國會中的反動政策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在它上層領袖之間，代表輕工業和大地產集團的塔虎脫與代表重工業和大金融集團的范登堡之間意見就非常不一致。史塔森也不是什麼「自由主義者」，他是公然反對歐洲社會化的第一人。而共和黨所會影響的西北部和中西部的農民與小製造商又被華萊士的政策吸引住了。

這裏必須指出：華萊士與第三黨運動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的進展，重要的是由於他和美國人民反對反勞工法的運動打成了一片。在實際工作中相輔相成，產生了相互推動的作用。這不但說明了華萊士運動之所以能夠開展的原因，而且也表示了第三黨更向前進所必須遵循的路線。

同時，我們也應該指出：摩萊與格林等工會上層領袖是擁護杜魯門政權和馬歇爾計劃的。有些進步份子，尤其是勞工運動中的進步份子，對於推動獨立候選人的工作還踟躕不前。他們生怕這個工作妨礙勞工政策的完成，不能擊敗那些支持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國會議員。所以今天在左翼方面有兩條陣線的政治運動，一個就是我們所申論的第三黨運動，一個是職工會為選舉自由主義的議員的運動。

當然，第三黨必需有一個合適的社會基礎——首先是有組織的勞工。但不幸工會少數勞工領袖是支持共和黨的，大部份工會高級人員又支持民主黨與杜魯門的。我們不能因為這些背叛工人利益之徒

拒絕支持華萊士，就斷言第三黨不應該成立。今天有相當廣大的工人羣衆擁護華萊士，贊成採取獨立政治行動。只要認識在一九四八年除人民組織自己的政黨以外，別無其他道路可走；否則只有坐在家裏不去投票，而默許反動份子再度盤踞在卡庇托爾山與白宮。第三黨的工作誠然艱鉅，但不去做却更會增加美國人民的痛苦。目前不但要選舉一個進步的總統，還要選舉進步的國會。現在僅僅死握着近視的「獎友懲敵政策」(policy of Rewarding friends and Panishing enemies)是比從前更加有害。職工會斥責過三百七十四名在職議員，因為他們贊成反勞工法。就國內政策而言，這個標準很公平，但那些投票反對反勞工法的一百另四名在職議員們，卻投票贊成「援助」希土的杜魯門主義。所以在國會議員預選會中，只要支持舊黨中的任何一個，那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行動自由，而削弱了自己選擇的權利。假若勞工和人民運動中的進步份子，縱令反對馬歇爾計劃和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希望阻止反動份子勢力的擴大，而現在的不動，客觀上就助長了反動。只有今天的行動，才能保證明天的幸福。

檢閱一下當前美國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的民主運動（這是匯成第三黨運動的主流），誠然是遠落在抗擊美帝國主義的需要之後的；但是造成美國的勞工運動以及一般民主運動的基本弱點的人物因素中，勞工聯合會的主要領袖以及大多數產業職工大會的上層領袖，不能推諉造成美國反動勢力日益猖獗的責任。由於他們的政策，甚至面臨了塔虎脫、哈特萊法案的威脅，勞工運動還繼續分裂。由於沒有動員勞工和勞工的同盟軍的共同力量去參加反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的積極鬥爭，甚至反而去

支持反動的主義與計劃，助長了反動勢力的增長。另一主要的弱點，無疑是受凱因斯 (Sir John Maynard Keynes) 學說惡劣的影響，以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能够克服的，大獨佔資本家總算是還能够解決困難呀！這種想法阻礙了美國勞工及進步份子的行動，軟化了他們的鬥志，淆亂了他們的步伐，不能提高政治悟性與警覺。但是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都是製造戰爭和蕭條的政黨，一旦經濟恐慌到來，廣大的美國勞工階級就會澈底瞭解，他們的禍患和災難沒有一個不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那裏產生出來的。儘管經濟恐慌是勞工階級所不願遭遇的苦難，但是在客觀上，美國的經濟恐慌却往往是勞工階級的一所最有效的政治大學。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的勝利和他底新政得以實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深刻地教育了美國人民。過去如此，未來還是朝着刺激與加強進步力量的方向前進。更加之今天舉世人民反抗華爾街奴役的鬥爭日益高漲，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與日俱增，一旦經濟恐慌到來，這種鬥爭與要求必更強化，同時對美國內部的鬥爭必有重大的影響，促使美國人民將反獨佔資本的鬥爭提高到和世界人民反對美帝鬥爭相同的高度，從而相互呼應，相互激盪，把歷史車輪推向美麗的明天。那時候，華萊士與第三黨的要求就勝利地實現了。

最近美國的情形，表面上似乎平靜無波，實質上却已在急劇的變化。這變化最顯明的一點，就是杜魯門競選勝利的希望已經決定的消失，而第三黨候選人華萊士的人望則飛躍的增高。我們不能為浮面的平靜所欺，水底的潛流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最近「幸福」雜誌舉行兩次測驗，華萊士在六個候選人中一直保持了很高的記錄。在距離選舉日期為時尚早的今天，竟有一千五百萬票擁護華萊

士。爲了這個原故，反動的「幸福」雜誌不敢把結果公布出來。穩健的觀察家認爲：除非國際局勢好轉，以及生活費用降低，今後勞工階級選民可能大量從民主黨轉移過來支持第三黨。斷言華萊士今年決無可能勝利，那是太早了。

現在不能抽象地估計第三黨的前途。第三黨候選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支持業已存在。至於它能够集合多少力量，當視發展中的鬥爭來決定，千百萬人爭取基本權利的有組織行動來決定。如果勞工、黑人和進步份子能够堅決組織他們的力量，一致支持第三黨獨立候選人，那末，和平、民主、進步、繁榮的鬥爭，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 六

「華萊士實爲美國反職人民的喉舌。」

——蕭伯納

「今天如果沒有華萊士，人民也要創造一個華萊士的。」

——格萊夫頓

對於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必須明確地認識他的爲人與思想。鬥爭中的中國人民，對他和第三黨的態度，亦應該有恰當的表示。我們若將華萊士與第三黨運動估計得過高，一如估計得過低，都是錯誤的。不論它現有的力量和成就如何，它是美國現實政治必然的歸趨；同樣的，不論它在目前和

將來如何轟轟烈烈地開展，它絕不能代替中國人民自己的鬥爭。在全世界反美帝國主義的戰略形勢下，中國人民與美國第三黨是排在同一戰鬥序列事的兩支友軍。在抗擊華爾街獨佔資本家的鬥爭中，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能够互相鼓舞，互相呼應，以粉碎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及其卵翼下的反動份子的妄圖！

先談華萊士其人及其思想。

華萊士的生平家喻戶曉。他幹過美國政府的農業部長、副總統、參議院議長、商務部長。前年九月，華氏抨擊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對對蘇強硬，獨管原子彈，結果引起軒然大波，被迫辭職。那時候，他熱誠地說：「爭取和平，較之高官厚祿尤為重要，較之政黨政治的顧慮尤為重要，……我將為和平而繼續努力。」以後主編「新共和」雜誌，政治家的華萊士乃以作家的身份為世界和平與繁榮而努力，以思想與言論喚起民衆，推動世界政治的進步。

在思想立場上，他並不是邱吉爾所說的「隱匿的共產黨人」，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正如華萊士自己所說：「華萊士乃是華萊士，既不是共黨份子，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乃是一個十足地的美國資本主義者，或者如同我（華氏自稱）在英國議會所說過的，乃是一個進步的保守主義者」（去年四月十九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說）。

檢討華萊士的全部思想，尤其是辭去商務部長以來的他的言論，我們應該同意他自己的說法。如果說他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實在未超過費邊社社員與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他是一個十足的美國資



本主義者，而他的主張與當前人民的要求相吻合。爲了實現他的主張，他必須與廣大人民採取一致行動。

這裏可以分開來討論：他底經濟思想並未超脫一般資產者羣思想範疇。他今天嚴厲地抨擊大獨佔資本家的胡作非爲，正因爲他深愛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他看到「資本主義在金融上已空前強盛，然而精神上已日近破產。就是爲了這種精神上的破產，資本主義在某種外來形勢的壓迫下，已被多種經濟獨裁制所取代，加之民主保障的壓力已隨着這種獨裁而俱來。」（原見華氏一九三六年著作「誰的憲法」Whose Constitution）因而他揭發社會經濟合作的觀念，認爲「合作的生活方式應滲入社會，這就是說除生產者的合作社外，我們同樣地也應有消耗者的合作社。」他並且堅定地說：「我相信我們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必須是一種人人富裕並充分有職業的資本主義」（見「明日的美國」，原載一九四三年八月號「自由世界」）。一九四三年九月在芝加哥「爭取和平委員會」上，他提出新自由宣言，就是以免於匱乏的自由爲本質，而將「免於憂慮職業的自由」列在七項自由之首，認爲只有這些才是持久和平的保障。以後出版的「六百萬個人工作」(Six Million Jobs 1945)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追溯學術思想的淵源，華萊士是羅斯福型式的凱因斯主義者。凱因斯主義是想解決或至少緩和失業羣衆日益增長的威脅，藉此以拯救資本主義制度。凱因斯主義者否認階級鬥爭的必然性，而主張促進一個各階級大合作的計劃，消滅生產力與人民消費力的裂口，以求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這理論不足爲訓，無庸在這兒多贅。值得指出的，羅斯福華萊士認爲增加實際工資，可以提高人民消費力

；凱因斯則認爲減低工資才能增加就業。因此當華萊士們從事提高人民購買力時，就捲入了猛烈的政治鬥爭，遭到大資本家的竭力反對，而爲廣大人民以及民主人士所熱烈擁護。在各種型式的凱因斯主義者中，只有華萊士周圍所團結成那個運動，是可敬的例外，堅守着羅斯福的傳統，警告人民要反對華爾街大亨們領導美國走向蕭條與戰爭。由此可見，華萊士實在是想拔除資本主義制度中有害的因素，藉以保全民主的資本主義。把華萊士看作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資本主義制度的破壞者，那離事實太遠了。

華萊士的政治思想，同樣沒有超越了資產者羣政治學的概念。他強調個人自由，決不在自由信念上作任何妥協讓步；他攻擊種族歧視，思想調查；他指斥美國法西斯蒂，金融寡頭；他支持各地人民進步運動，民主措施；那並非由於他是蘇聯的工具，共黨的傀儡，而由於他是華盛頓，傑弗遜，羅斯福——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的驕傲的繼承人。他極有眼光，能拆穿美國反共狂的隱私，指出他們並非恐懼共產主義，而是恐懼民主政治。他的經濟思想宏大了他的政治思想，互相爲用，使他的民主觀念更富有生命和活力。這種思想推廣到國際政治方面，根據他的遠見，看出「美國雖在戰爭中壯大，但也從戰爭中產生了危機，這個危機是一定要爆發的，必須及早提防。」而美國「不能靠武器來戰勝危機」，利用金元也不是戰勝危機的辦法。他認爲「共產主義不過是爲了終止貧窮與剝削的主義，豈能以大砲坦克把它毀滅？我們祇能以更好的主義使它失去自然的效用」（去年四月十一日在倫敦演說）。因此，他希望在國內堅決執行「和平、自由與充分就業」，在國外實行「超特的新政」，那麼，「美

國內的經濟不景氣也可以消滅，世界貿易可以發展。在繁榮的世界上，共產主義將無從插足。」（去年四月十三日在倫敦演說）引伸到外交領域裏來，他支持聯合國機構，主張與蘇聯及東歐各國取得政治上的諒解，經濟的互助，並通過聯合國機構實施援助各國復興的計劃，以代替侵害各國獨立與主權的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由此可知，華萊士從來不是胡適之流所稱的「孤立主義者」。（這個標榜實驗主義、凡事主張拿證據來的所謂「自由主義者」，竟下流無恥到含血噴人，妄加歪曲，真不知其老且醜也！）綜合這些意見，華萊士是希望美國適應當前的世界潮流，在這平民世紀裏，以天下一家的理想，使繁榮壯大的美國能够「站穩不倒」（華萊士語）。這種理論，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是個十足的「美國資本主義者」呀！

假如以上的分析沒有錯誤，而且言之有據，那末華萊士與美國第三黨運動對我們中國人民的影響以及我們中國人民對他們的態度就可以清楚地分述出來。

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華萊士奮身組織新黨這個英勇的事實，告訴我們要清除對美帝國主義統治集團的一切幻想。不只是共和黨，而且也有民主黨，都是製造蕭條與戰爭的黨，要民主共和兩黨中的任何一黨採取民主和平的政策已不可能。華爾街的大獨佔資本家已經下定決心，要攔阻前進中的世界和人民，使倒退向戰前的舊秩序裏去。這個結果還不是「一個世界」或者是「兩個世界」的問題，根本是人類是否能够生存的問題。華萊士獻身於這一偉大的鬥爭，一方面使世界愈加確定地知道美國人民並不站在兩黨的反動的戰爭政策後面，逼使魔鬼現出原形，驚醒人民奮起自救；另一方面使

世界確切明瞭美帝國主義集團決心反民主反人民，只有一致奮起抗爭，不能存留絲毫幻想，千萬不要再以君子之心來度小人之腹。和平民主進步繁榮的前途是靠人民爭取得來，而不能幻想從天而降，或者靠催眠術之類所能達到目的。

第二點，華萊士組織新黨反抗華爾街的統治集團這一事實，更堅定了我們反抗美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決心，並且相信美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是一定可以打倒的。華萊士與第三黨運動，表示了美國統治階級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已經孤立起來，不僅在國外而且在國內已經遭遇反抗。二十世紀的美國是決不能做到十九世紀以前英國所能做到的事情了。這個時代的轉變，連資產階級的華萊士也明白的。只要全世界人民團結一致，堅決反帝，華爾街大亨們的妄想是可以粉碎的。反動勢力不可怕！低估美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的力量，固然很危險，低估了人民自身的力量也是同樣的危險。正像世界局勢對美國內部鬥爭發生重大影響一樣，反過來說，華萊士與美國第三黨的奮鬥也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反對美帝鬥爭。從而相互磨勵，相互呼應，產生更強的信念與勇氣，把人民歷史的新頁揭開。

末了一點，反對美帝鬥爭是舉世人民當前要務之一，正像不能因為有各地人民的反對美帝鬥爭，就鬆懈了美國內部的反對美帝鬥爭一樣，我們同樣也不能以美國內部的反對美帝鬥爭來代替中國人民的反對美帝鬥爭，而把中國人民的希望一股腦兒放在華萊士的身上。

例如有這樣的意見：

「……我以爲美國的態度是決定世界禍福的轉扭；因此，我寧肯配帶華萊士能被選爲下屆

總統，此事不僅關於美國人的前途，同時亦關係世界的前途，而中國問題的光明亦包括在內了。」（香港「時代批評」第九十七期，「表示一個願望」）

我們決不能苟同這種意見。如果「世界禍福的轉扭」真的只決定於「美國的態度」；「中國問題的光明」包括在「華萊士被選為下屆總統」以內，那麼，全世界反對美帝及其走卒的民主鬥爭可以休矣了！美國態度真的能夠決定一切，我們就大可不必流血流汗，堅苦奮鬥，以表現我們求取民主和平的意志了。再則把希望完全放在華萊士身上是否應該呢？（一）華萊士與第三黨的勝利還在未定之天；（二）華萊士縱即當選了，萬一不幸竟未能改變美國對華政策，我們又將如之何？（三）華萊士與第三黨的空前勝利，也並不等於全世界的（美國中國在內）人民革命。所以把希望放在這裏，是有害處的；助長幻想，懈怠努力，延緩了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革命必須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但我們可以從華萊士及美國第三黨運動獲得鼓勵與激盪，把革命鬥爭堅持到底。這就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華萊士本身儘管是有限度的，但他反對現階段美帝國主義政策，主張充分就業，全球繁榮，就一定要與全世界人民聯合奮鬥。這奮鬥會促進新形勢到來，新形勢又會反過來創造新的華萊士。我們深信華萊士是人民世紀的驕子。美國統治集團從未出來過這樣偉大英明的「叛徒」。只有在人民世紀才能產生的啊！

華萊士戰時曾來中國，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五日離渝後一天，曾與中國重慶當局發表聯合聲明。他

在戰時的言論，對於中國進步人士是一種有力的感召。勝利後局勢大壞，他對中國人民的熱望，未嘗片刻漠視。他反對援助中國內戰，贊揚土地改革。他不僅是美國反戰人民的喉舌，而且是舉世反戰人民的喉舌。

在作為反動勢力堡壘的美國，我們有這樣偉大的友人與友軍是值得驕傲與興奮的。謹頌華萊士第三黨健鬥，勝利！

## 七

「祇有一切為民主和平而奮鬥的份子合作，民主自由才能够被保存。」

—— K·齊里亞古斯

關於華萊士與美國第三黨運動，現在還不是下結論的時候。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運動，有吸引力的結合。它一定有望望前途的。因為美國的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作為這故事的脊梁的，不是以華爾街為靠山的反動份子，而是與華萊士偕行的廣大人民。

且看華萊士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晚上宣布獨立競選時所發表的和平、民主、進步、繁榮綱領吧。在內政方面，他說：「……為了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我們要戰鬥。為了結束種族歧視，為了低廉物價，為了自由的工會職業，為了要人人能安居的房屋，我們要戰鬥……。」

在美蘇方面，他說：「……本人堅決反對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或擴張主義，……我籲請蘇聯及美

國以客觀的立場來考察彼此的異見，並摒棄在雙方散播憎恨種子的人所製造的偏見。世界今日所最需要的是一個聯合國裁軍會議，使人類永遠脫離原子彈以及其他一切集團破壞方式的威脅。」

在復興歐洲方面，他說：「本人過去曾奮力反對對希望取得耕犁的人給予槍砲，……我奮力反對現行的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因為它們把歐洲分裂成兩個戰爭氣氛的對立集團。那些在政治上被我們用糧食收買的人，不久就會拋棄我們。他們會暫時感謝我們，但轉過身來就會憎恨我們，因為我們的政策摧毀了他們的自由。」

在戰爭與和平方面，他總結地說：「新黨應以繁榮和安全為方針，決不以匱乏及戰爭為目標；我們必須組織和平來防止經濟恐慌及戰爭。今日美國的政策，在通過美國的機構而不是聯合國的機構來復興西歐及德國，使蘇聯不能加入；這是英法在第一次大戰後所採取的政策，其結果都是紊亂與經濟恐慌。其實並不需要紊亂與經濟恐慌發生，因為組織和平、進步、繁榮的代價，實在遠較組織戰爭廉賤呵。」

華萊士所發表的主張聚舉在這裏了。這是一個新的聲音，讓美國人民來抉擇吧。人民是不朽的，我們相信人民有抉擇的能力。新的美國在成長，我所指的是美國人民，而不是紐約的摩天大樓，好萊塢的下流電影。一般美國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有了值得注意的變化，他們已經慢慢認識那腐朽的舊黨。工人們開始有了獨立自由的思想，真正的團結，和他們民族使命的自覺。進步的知識份子日見增多，逐漸覺醒。以華萊士為中心的大團結正在展開。固然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集團，然而是一個極可注目

未可限量的少數。用華萊士的話說，是一支「基甸的軍隊」(Gideon's Army)。這些人們是能够思想、戰鬥、追求的集團，他們的成就也必然將和他們的努力相稱。

美國現在正處於一個決定性事件到來的前夕。我們不能斤斤計較華萊士與第三黨究竟有多少力量。力量是組織起來的，組織有待於及時的行動。「羅斯福所失敗的場合，祇是因為他缺乏有組織的支持。他沒有可以運用的聯合一致的勞工運動以及堅強的自由主義運動。」(華萊士語)所以今天必須立即行動起來，華萊士說得好：「如諸君不立即採取行動，那就與任令希特勒奪取政權的人犯了相同的罪戾！」

祇要一切為民主和平而奮鬥的人們團結起來，人民運動在一九四八年就能得到它應有的收穫！

(四月九日黎明之前)

## 美國第三黨副總統候選人

### 格倫 · 泰勒

愛達荷州 Idaho 參議員格倫 · 泰勒 Glen Taylor 是美國國會中最知名的進步人士。今年二月廿三日，他發表一篇爆彈式的聲明，宣布脫離民主黨，參加華萊士的第三黨，共同從事勇敢光榮的和平奮鬥，當時華萊士坐在他的旁邊，他對華萊士說：「華萊士，我跟你一道從事這個偉大的新事業，我覺得很快樂而且光榮。」這是第三黨繼紐約布朗克斯區選舉大勝之後的又一勝利。它不只是一個人加入第三黨，而將能吸引萬



千人來投第三黨的票。泰勒率直而明確的聲明，力能起頑立懦，解惑去疑，使千千萬萬要和平不要戰爭的人，挺起身來做個自由人！

格倫·泰勒在美國大眾的眼中不是無名之輩。他在國會討論塔虎脫·哈特萊法案時，曾為勞工權利大聲疾呼，演講達十八小時半之久，名聲轟動全美，去年十一月杜魯門召開國會特別會議討論「援」外時，他從加里福尼亞州騎馬直達東部，到處抨擊美國反動的外交政策。

這位一度做過牧童的參議員，曾在五金廠中度過一段艱苦的生活，接着便參加他底哥哥的巡迴劇團，在各地旅行表演，走遍了大小城市和鄉村，接觸到人民實際生活。從那時候起，他努力讀書，觀察現實。一九三七年決定獻身政治舞台，決心使人民被愚弄的悲劇及早終場。經過一九四〇與四二年兩次失敗，一九四四年間，泰勒終於當選愛達荷州的參議員，打败了著名的孤立派克拉克(D. W. Clark)。從牧童到參議員，他底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政治演進史的生動的一頁。

泰勒在大多數問題上，從種族平等到對蘇友好，一向是支持華萊士的立場。今年三月九日的演說裏，他特別抨擊美國的遠東政策。譴責美國重建日本軍事力量，反動派控制着朝鮮。說到中國，他問道：我們（——指美國）在中國做些什麼呢？他指摘那些腐敗、貪婪、兇殘、沒有一點為人民福利打算的當局者，他說：「中國目前的混亂情形是美國從來所做的冒險事業中最沒有價值的一次。」

美國反動派面對着如潮初湧的進步力量，竟採用最卑鄙的手段來對付民主進步份子了。泰勒於今年五月一日出席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城南黑人青年大會演說時一度被捕。因為他打算從專供黑人進出的大門入場，警局就以「妨害治安」罪將他拘捕。後來經過印指紋和具一百美元的保結，才獲自由。這不僅顯示美國的種族歧視已至瘋狂的程度，而且是對進步領袖直接施行惡毒的迫害了。

泰勒現年四十四歲。妻子名叫派克(Dore Pike)，生了三個孩子。平富力強的泰勒，前面有方興未艾的鬥爭，身後有無數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必能為民主和平、進步繁榮貢獻出全部心力。

## 我為什麼競選總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夜，華萊士在無線電中向全國宣佈以獨立身份競選總統，隨一年餘之第三黨運動於焉蓬勃展開。在這一宣言中，華萊士批判了華爾街控制下的二黨集團所執行的國內外反動政策，並提出了和平民主的方案。這宣言，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接編「新共和」時所發表的那篇宣言，為時恰距一載。接編「新共和」的宣言，標誌了美國人民運動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競選總統宣言則又說明了人民力量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本文係根據「新共和」所載原文譯出，在文字上與當時廣播聲明略有出入，附此聲明。

我相信以獨立的身份出而競選總統的時機業已來到。我信仰世界民主的希望，我深信這一希望在我們這一代就能够實現，不僅是爲了美國人民，並且也爲全世界人民。可是，我又看到這一希望已因目前的趨勢而陷於危險。

我因看到這一世界上最富足、最強大、並且對我也是最美麗的國家，遭受到恐懼之侵襲而憂心如搗。今日全世界人民中，單祇我們在惶惶不可終日，一似世界末日已在前面不遠。我們恐懼戰爭，我們期待蕭條。我們坐待着聯合國的毀滅，以及天下一家之被分裂爲二個世界。對於那些承認所有這些事實而又說「這是一個等待的時候」的人，我的答覆是：我們不能等待；美國人民的幸福要求我們現

在立即行動。

我們的勞工，恐懼目前職業之不穩定；由於他們的實際所得在隨同物價上翔而傾降，他們的生活水準正日益低落，並也感覺到新債務的負擔。

我們的母親以及她們在學校裏的孩子們，恐懼那迅速發展中的普遍軍訓法案，它將從千百萬美國孩子的生命中剝奪掉寶貴的一年，而用於無用的目的。

我們的商人們恐懼他們市場的不穩定。成千成萬的獨立小生產者，初次真實地感覺到了龐大的獨佔資本的排擠與壓力。

我們的農人們恐懼他們的繁榮將在旋踵間消失。

千萬百萬的美國人民不敢對明知是危險的、毀滅性的政策，直言反對。如果他們坦白直言，他們知道自己將立即喪失掉職業和社會地位。他們飽受着那種對一切進步意識都戴上紅帽子的流行運動之威脅。

就在我們這一代的短短的生命中，我們已然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六七次期間長短不同的不景氣與蕭條。但這裏並沒有健全的理由以認定災難是無可避免的。我知道人類據有足以防制戰爭與不景氣的能力與智慧。承認戰爭及不景氣之無可避免，也就是否認了民主；而以爲個人的不安全是我們生命中的必需部份的那種附帶觀念，更是荒謬絕倫的。

我信仰挺立起來、直言無忌的那種美國傳統。我決心要使美國人民有一個免於強暴脅迫而直言無

忌的機會。

## 兩黨集團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一黨統治之下。任你是對分贖不均的攻擊，對策略及時機的分辯，或是爲爭取自由份子支持的堂皇動聽的言論和種種姿態，都不能掩蓋這一基本的事實。我們的民主基礎是在於表達出公民的自由抉擇；可是，在直接有關全體美國人民生活的、基本的外交及內政問題上，今天我們都被剝奪了選擇的機會。即使在戰爭期間，在羅斯福主持下，政黨政治還是繼續實踐；可是現在，在勝利以後的第三個年頭，却藉口未宣告的緊急狀態，而以兩黨集團的統治加在我們的頭上。和平時期的一黨統治，是對民主的一個真正威脅。

固然這兒正存在着一個緊急狀態。在全世界，所有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都依持於美國的援助。但是，兩黨集團却不是爲了應付這一種緊急而被組織起來的。它的組成是爲了實踐一個基於恐懼與憎恨的外交政策；它的成員是那些反對抵抗法西斯主義的人，扼殺「聯總」的人，以創造杜魯門主義而直搗聯合國的心臟、同時又以馬歇爾計劃來棄却聯合國的人。一個聯合政府也該是需要的，如果它是代表全體人民的話，但是兩黨集團並不是廣泛的聯合，它祇代表權力集團的少數派。放棄了我們國家的歷史與傳統，他們已把美國人民跟那些根本不尊重美國理想的反動份子及獨裁暴君結成了聯盟。

祇有當美國人民驅除了兩黨集團以及它所引起的各種歇斯底里，我們才能真正走上國內國外的進

步道路。今天千百萬美國人都已明白了這一點，而當事實愈演愈明顯的時候，更多的人民也將知道這一點，我之站出來作為獨立候選人的原因，就是要給予美國人民以自由抉擇的民主權利。

### 我們的世界政策

當我擔任副總統的時候，以及後來在一九四七年五月間從歐洲回來以後，我都曾提出過全面的援外計劃。我並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孤立主義者。早在馬歇爾計劃出現之前，我就主張着馬歇爾計劃，但是，那是一個團結世界的而不是分裂世界的方案。

我會堅持援助之給予，必須在國際機構的主持之下，並用於生產之目的。我曾一直主張牽引車、而非坦克車，犁耙而非槍炮。我會贊同經由科學技術以增進世界生產能力的國際計劃。

就是那些曾把我的這種主張稱作爲「國際投機」(Globaloney)的反動份子，今天却全力支持着現政府那一套危險的援外計劃。他們需要政治的操縱以及片面的管理，他們有興趣於對外國的干涉。他們應用了我提出那被他們稱作爲「國際投機」的計劃時所用的字眼，來騙售他們自己的方案，但他們的目的則是截然不同的。

看到這些對國內的健康、教育以及社會安全從未發生過真正興趣的人，一談到歐洲人民的貧窮苦難時，就如此其滔滔不絕而慷慨激昂，實在是够奇怪的。他們並沒有以較關心美國人民福利的更多真誠，來關心歐洲人民的幸福。他們的援助將不會真正爲歐洲人民服務，到頭來，他們的計劃，終將使

我們成爲全世界最受憎恨的國家。如果一個借錢給我的銀行家，迫着我違反了我自己的信念而投票選舉他的夾袋中人，我對他將有無盡憎恨。現在美國就是一個世界的銀行家，而在今日議會安排下的那一援助方案，就是想告訴債務人他們應該怎樣投票。

我們代表着一個能使世界爲和平而團結一致的美國。聯合國憲章是我們的嚮導。在尋求世界復興的努力中，我們並不認蘇聯爲一無過咎，但也絕不贊同把一切責任都諉過於蘇聯的那些企圖。而且，即使我們接受了一切對蘇的指摘批評，却並不就表示我們寬恕了那一個違背美國原則和美國希望的美國政策。

美國人之需要幫助國外人民，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今日擬訂中的援外方案，並沒有反映他們的民主的意念；它的確將爲將後的其他援助方案，播下厭惡的種子，除非它能以國內的健全計劃與管制爲配合。爲支持這一缺乏遠見的政策所必需的一切援外措置和龐大軍備，其所能引起的物價高漲的後果，將促使家庭主婦及工資收入者，撤銷他們對「世界一家」之崇高目的的獻身。

由杜魯門所發動、華爾街所控制、軍部所支持而由愛好和平的公民出錢的，以美元來支撐希臘反動政權的政策，已經失敗了。我們的第一筆對外貸款，原是以協助復興建設的幌子而贖售給美國人民的，却終被用於購買軍火以消滅幾千名游擊隊；而如今，希臘游擊隊却較前愈益壯大了。對於每一名爲美國子彈所殺死的游擊隊員，其答覆則是國務院支持下的希臘政府的恐怖主義及貪污腐化所製造出來的數十名新的游擊隊員。各國人民對美國的愛好是強烈的，却不是無限度的。而我更要指出，

今天的「一黨」聯合政權，正在浪費那經由幾個世紀才贏得的、並在羅斯福時代還繼續存在的全球敬愛與道義上的領導地位。

一個基於反蘇反共觀念的歐洲復興方案，將是對美國資源的無限制的抽吸。在戰後歷次選舉中都會贏得大量選票，却因美元的壓力而被剝奪掉他們藉由民主手段以獲得的政府職位的法義二國的共產黨，將被迫運用愚笨的——雖然仍屬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的——手段，來擊敗美國的援助方案。

往後，當美國外交政策的支配者附加在援助方案上的操縱權日益增加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和其他人民也將對我們不懷好感；而最後，今日之冷戰將轉而為炸彈飛擲，以及穿着北極服裝的美國士兵躺在蘇聯雪地中的真正戰爭。

### 獨立的行動

我要重複一句：我們的援外方案，必須解脫掉政治的干涉，這就必得經由聯合國而採取國際管理。可是，鑒於他們出賣並欺騙聯合國的紀錄，我們決不能期望今日二黨集團的領袖們會出來為這一個原則而鬥爭。

我要重複一句：我們的援外方案必須以國內的健全計劃及管制為配合，如果不能在國內有效地管制通貨膨脹，必將導致孤立主義觀念復活的後果，這就會使天下一家的所有希望全部歸於毀滅。

可是，這恰就是今日的趨勢，而由於今日的趨勢是必然引向苦難的，我們就不能空事等待。二年

以來，以所有這些事實爲根據，我們會試想喚醒現存的政黨從事於防制通貨膨脹的迫切工作。一年以來，我們始終看不出現存政黨願以新的精神來盡力謀致世界和平及世界了解。二黨集團的領袖們頑固地執着於他們的分裂世界的基本政策。我們曾一度基於全美國人民的自身利益，而呼籲政府採取明顯而必要的步驟，以防制膨脹及國際分裂。現在，我們已明白向今日支配着二黨的自私集團提出呼籲，是全然無用的。他們所能理解的，祇有全體人民的意志壓力。而今天，這一壓力必須成爲有組織的、有所指的壓力：組織成進步的政治機構，指向那全面的進步方案之最後完成。

### 獨佔資本

要征服那對我們國家每天培育出新的危機的、受有遇到的滋養的、並且是自行持續的恐懼，我們必須充分揭露獨佔資本家對我們國民生活所加施的掌握操縱。

基本的事實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指揮權，目前並不屬於全體人民，而是操縱在數目相當少的富人們手裏。目前構成政府的基礎的，並不是全民的福利，而是工業鉅頭與金融鉅子們的特權。這些鉅頭們同時控制了那二個政黨。我在坐過了哈勃脫·胡佛和傑西·瓊斯的位子而作爲商務部長之後，才真正了解到這些主要的鉅頭們的陰謀詭計。

無論共和黨或是民主黨，都不能爲美國人民的福利而工作，因爲這二黨的最主要的考慮，祇是獨佔資本的利潤。這就是今日美國工人的四十九元的平均週薪，已貶值到買不到一九三九年時二十九元



半的工資所能買到的東西的原因；這就是公司利潤由一九三九年的五十億元，激增爲一百七十五億之高額的原因；這就是二大政黨視真正的物價管制如疫厲而非要去之不可的原因。高物價意味高利潤，而高利潤恰就是那些控制着二大政黨的人們之最主要的目的。

今天的驚人的高物價及高利潤，都是他們的預定計劃，這是由反對爲和平與繁榮而計劃的人們所計劃下來的。任你高聲的否認及惡毒的恫嚇高唱入雲，但在美國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之前，這仍將繼續是顛撲不破的事實。

很久以來就一直遭受到各個時代各種信仰的美國人民之攻擊的這種獨佔控制，並不是新鮮的，但是到了今天，它已發展成爲一種威脅着全世界每一個男女老幼的大災難。

在對獨佔資本的反對上，我們又回到了我們祖先父老們的信仰。我們再度喊出了美國之聲，重又像傑弗遜時代一直到羅斯福時代的祖先父老們那樣地攻擊獨佔資本。傑弗遜在共和國的最早期就會贏得了這一鬥爭，雖然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形式的獨佔資本，是在內戰以後才開始發展起來的。林肯，以他那驚人的先見，意識到了它的開始。在對美國人民的鄭重警告中，他說他恐怕金融權力的集中，將繼續成長、擴展並累積，直到全美國的土地及政府都將爲它所有，而非美國人民所有。

早在一八八八年，克利夫蘭就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宣稱：「原該是在精密限制下的法律產物、並作爲人民的奴僕的『公司』，却正在迅速地變成爲人民的主人。」

在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總統說：「美國政府的主人是美國的康拜因資本家和製造商。」在威爾遜

時代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業的公司，握有全國非金融公司的全部財產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到三十年代的中期，他們所有的財產，已佔到百分之五十五。

在一九三八年，羅斯福在他致國會的一件咨文中宣稱：「如果人民聽任私人權力增長到較諸民主國家本身還要強大的程度的話，那末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就將岌岌可危。這，在它本質上，也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又繼續警告說：「就在我們中間，史無前例的私人權力的集中，正在迅速成長中。」

在戰爭期內以及戰爭結束以後，這種私人權力的集中，更以如此未諸前見的速度繼續擴張着，以致到今天我們已可以說：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從沒有如此少數的幾個人，犧牲了如此多的人，而握有如此多的東西。

二大政黨都在爲那犧牲了如此多的人而據有如此多的東西的少數人，忠誠服務。它們同樣扼殺了物價管制、支持二黨外交政策、通過了塔虎特——哈特萊法案、並贊成德國的重建。對於這些行動，政府也曾有過柔弱的、口是心非的反對，但他們既沒有真正打擊金融集團的意念，更沒有這種力量。

### 第三黨

羅斯福總統運用了他那爲美國歷史上所罕見的政治手腕，而促使民主黨回到了傑弗遜、傑克遜和威爾遜的原則。由於他以進步的方案直接訴諸人民以獲取支持，乃能調適了南方的反動份子，迷惑了大城市黨機構，並調和了最爲複雜分歧的區域、宗教及種族的利益。但是當羅斯福逝去以後，胡狼就

又準備好了撲。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他們就已在實際上幾乎摧毀了每一件他所堅持的東西，一面却仍然口是心非地談起他的原則和他的方案。

民主黨，恰與共和黨同樣坐視不救地看憲法和權利法案之遭撕毀，顯然兩個政黨都毫不介意於這一個事實：當任何一個美國人民的權利被任意侵凌的時候，就沒有一個美國人的自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二個政黨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反對種族及宗教歧視的有效鬥爭，都沒有爲了黑種人民的權利、爲了取消聖約限制及反猶主義、爲了一個真正的「公平僱用委員會」●的創立、爲了擊敗人頭稅以及爭取聯邦反私刑法律之通過而鬥爭。沒有一個政黨會起來保護「第一修正案」●，當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遭受摧殘的時候，二黨都默不作聲。對於每一個反對者，二黨都呼號着：「赤化！共產主義！」並且同樣運用紅色恐怖來掩蓋他們對人民的掠奪。我們今天要爲一磅牛油付出一元另五分美元，並爲其他必需品付出同樣昂貴的代價，部份的原因，就是爲了煽惑人心的「赤色」●喊叫，已將美國人民的注意力引離了真正的問題。

這些人爲捏造的恐懼必須被克服。我堅信美國人民必需有其與表示恐懼的同樣機會，來表示他們的希望。

我之決心協助供給一個表達的工具，是我在幾年政治活動之後經過幾個月的深思熟慮的結果。對於這一個政府，很久以來我就試着對它忍耐，對它樂觀。我曾希望一個光明的國際景象之出現，會促

使協議成爲可能；我希望在一年來我們所舉行的歷次盛大會議中所表現的人民的感覺，能促使政府進步。我仍然相信我這種儘可能的耐心等待，還是正確的。而我目前的這一最後決定，其動機僅在給予美國人民以一個投票選擇和平與安全的機會。若干主要州區的選舉法的限制，使我們不能再事延遲，如果我們需要一個能够及時生效的獨立候選人的話。

### 選舉年的口惠

我認定進步份子必須控制政治機構，否則，他們所堅持的原則除了能換來二大政黨的選舉年的口惠之外，將一無所得。民主黨將較共和黨發出更爲美麗動聽的口惠，可是它們的動作，在實質上將並無差異。

杜魯門總統在二年前所發表的國內形勢咨文，其中就包含了一個健全的新政方案；而當時的國會雖然還在民主黨的控制之下，咨文的主要部份，却沒有被制訂成爲法律；我斷定杜魯門在選舉年中所宣佈的方案將遭遇到同樣命運。如果其中的任何部份竟然能由國會訂成法律，那將是因爲有組織的、獨立的進步份子準備投票，並說出了政客們所懂得的語言的緣故。

在羅斯福與政客之間，是存有極大的差異的：羅斯福宣布了一個方案之後，立即就着手號召人民予以支持；政客却祇是宣佈一個方案而已，他自己對之既無信心，更且根本並不準備爲它而鬥爭。如今羅斯福已經遠去了，唯一的替代，就是由真正的、染色不退的進步份子所管制使用的一個實際的政

治機構。

在一九四四年時，我曾向民主黨中的腐敗機構及南方反動份子，進行過一次鬥爭，這鬥爭我是失敗了。當時有許多進步份子就敦促我脫離民主黨而另行組織第三黨，他們說，羅斯福已經出賣給反動份子了。當然，他絕沒有如此。他祇是爲了想贏得緊接戰爭之後的和平而妥協的——他要引使保守份子甚至若干反動份子，在他自己的領導之下，來共同致力於一個與蘇聯合作以贏得戰爭并保障和平的方案。他并不想堅持我之接受提名，如果這一提名將引起那些一向不贊同我的國內經濟與反人頭稅等等立場的人們之反對的話。

而奇怪的是若干在一九四四年時甘冒於戰爭最緊張的關頭分裂羅斯福的支持者的危險，而勸我脫黨的人，今天却在反對獨立的行動。在一九四四年我特別強調地說「不」，因爲當時是羅斯福在掌舵，而且在議會裏還有大批的進步份子值得支援。當時我相信最後我終將贏得這一對民主黨中腐敗勢力及反動份子的鬥爭。

當我在一九四六年秋季脫離內閣而從事進步的民主黨的運動的時候，我依然對進步的民主黨人保有若干希望。這一羣男女，在今天極其重要的。在今日民主黨內，還有許多優秀的進步份子，——在議會中有少數人，在地方及州機關中更有千百人。我相信使他們得能重獲當選的最可靠的方法，便是對他們的努力，輔之以一個基於主義原則而非政治便宜的攻擊力強大的運動。這一運動將引使千百萬選民走出家來投票，而如果在總統競選中他們祇能在二害中取其輕的話，他們是寧願留在家裏的。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投票政策之破產，已在一九四六年的選舉中有了極其明顯的證明。在當時「產業組織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曾感到執行這一政策的必要，他們就以經濟及努力來支持「小害」；而就是在這樣情形下獲得當選的大批「小害」，竟投票通過了塔虎特——哈特萊法案。

在常常說到大害小害的人的心目中，似乎都承認民主黨是「小害」，共和黨是「大害」，從而就承認我們的選擇對象祇是二個程度不同的魔害。而在我個人可還不相信美國人民的福利，可藉選舉任何程度的魔害而得到挽救。

### 共產黨問題

許多支持我的決定的朋友們，事前曾提出這樣一種辯詞，說是這一行動是危險的，因為那恰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可是我從不相信爲了碰巧能贏得與你意見有着基本差異的人們的支持，你就該放棄你那有原則的立場。過去曾不止一次地有人告訴我我不該反對人頭稅，因為那恰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可是我仍然繼續反對人頭稅。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在過去一年中我一直在敦促一個基於對蘇了解的外交政策。曾有人告訴我這也是危險的，因為這恰也是共產黨所需要的。那末僅有的道路，就祇有支持現行的軍國化的二黨外交政策，或是乾脆縮回到孤立主義的老窠裏去。如果把對蘇和平以及對蘇了解的工作，留待少數共產黨人單獨去做的話，那才是真正危險的事。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有意義的進步運動而獲得成功，我們祇有爭取領導，并全力

爲我們所爭取的目的而鬥爭。

我竭誠歡迎那些深信祇能藉準備和平才能獲得和平、不能藉準備戰爭以獲得和平的人，所給予我的支持。我要動員起一切爲和平而計劃的思想。我要讓世界各國的人民都知道：除了一個處心積慮地想支配他們的政治、控制他們的經濟的美國之外，這兒還有另一個美國；我要使他們知道，美國的勞工、農民、小商人以及自由職業者，都是他們的兄弟，而不是他們可能的主子。我要擊毀那將美國引進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普遍軍訓方案。

那些把我們這羣爲我們國家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與幸福而戰的人們，稱作爲「蘇聯工具」或是一「共產黨人」的人，是在運用着希特勒的武器。這表示他們寧願與蘇聯決一死戰而不願藉和平的道路來解決二國間的分歧。我們是爲爭對蘇和平而戰——是的；但是在鬥爭中我們還攜同着這樣一個信念：相信我們能使我們的制度好好工作。我們不是爲了蘇聯，我們不是爲了共產主義，而是爲了和平，爲了使真正的美國主義重新回到美國。

### 我們的將來

有人在說由於缺乏經濟的支持，獨立候選人的運動，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們說爲了進行這樣的運動，必須有數百萬的金元。我如此堅信二大政黨是爲大財閥集團所控制的，我更完全清楚財閥集團的報紙之對我反對，但我依然對民主抱有信心。我堅信能在一九四八年展開一個人民的運動。

假如用於政治運動的經費，祇能得自幾個「巨頭」的話，那美國才真的變成了蘇聯口中所說的那種美國。我否認這種觀念。我相信人民依然能够使民主制度發揮作用。我并不爲經費擔心，因爲我相信我們將從家庭主婦、打字員、自由職業者、勞工、店員、侍役以及其他願意從事於這一爲大財閥的金錢所買不到的事業的人的捐獻中，得到千百萬元的經濟支持。

我們將需要錢用，而我相信我們必能獲得。我們將不需要「華爾街——軍部」的支持，因爲我們是建立在基本的原則而非政治便宜主義之上的。我們將必然遭受攻訐咒罵，但這對我們將毫無損傷，因爲我們深記得傑弗遜、傑克遜、林肯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所曾遭遇到的侮辱與攻訐。我們決不讓衆院非美國活動委員會及其他「污辱專家」來擾亂我們。我們將遠矚着我們的將來，并堅信在十一月中國人民將站立起來做一個人。然後全世界就將知道：在美國，爭民主爭安全的意念究是多麼強壯有力。

x

x

x

x

當我在我的第一篇「新共和」社論中寫下：「作爲「新共和」的編者，我的任務是在於協助建立一個進步的美國。那是一個鬭爭的任務，是我歷來所担任過的一件最有價值的任務」的時候，距今已有整整的一年。

這是一個收穫豐滿而極有價值的一年；現在，雖然組織的工作依然如舊，我自己的任務却已有了改變。從現在起，我要以我的全部時間致力於把我的理想與觀念帶給每一個美國人民。同時我將繼續



作爲一個特約編者而每週爲「新共和」寫篇專欄。

但是由於我不能同時作爲一個政治運動的候選人和一個獨立的進步的雜誌的主編人，我已自本期起辭去了「新共和」雜誌的主編職務。鑒於過去一年的成就，我在這樣做的時候，不禁滿懷驕傲，同時亦深信在密却爾·史却萊德的主編之下，「新共和」將繼續是一個爲更好的世界所必需的聲音。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新共和」)

(註一) F.F.P.C.—Committee on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是個致力於取消僱用中的差別歧視的機構，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創時 原置於 生產管理局」之下，後於一九四二年七月改隸「戰時人力委員會」。

(註二)「第一修正案」，係指美國憲法的第一次修正，其中包括「人權法案」，取消奴隸制，確定公民資格及其權利等等。

## 第三黨與美國傳統

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展開後，反動份子咸斥之爲違反美國二黨政治的傳統，若干「自由份子」亦隨聲附和，持之爲反對的理由。華萊士特撰本文，指出第三黨運動實在是美國傳統中最尊貴的一部份，更是美國進步的基本動力。

常常有人說第三黨是違反美國傳統的——是走向多黨政治——它造成了歐洲各國的政局混亂——的第一步。

而我的意見則認爲第三黨是美國生命中極端主要的一個成份，要不是它，美國將永遠處在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也許我們應該用「獨立黨」或是「進步黨」，而不用「第三黨」這個名詞，因爲「新黨」常常會變成「第一黨」。

回頭看過去一百五十年間，我們能發現到我們之得能進步，大部份該歸功於新政黨的崛起。傑弗遜震怒於取締外僑及叛逆的法律●而於一七九八年着手組織新黨，直到一八二四年止，這一新黨一直在當權執政。傑克遜則於一八二八年着手組織新黨，自後到一八六〇年止，其中大部份時間都由該黨秉政。

凡是獲得成功的新黨，通常總是取代了舊黨之一的地位，或是根本取消了舊黨之一的存在，例如

傑克遜的民主黨就取代了傑弗遜的共和黨的地位。

一八五四年在威斯康辛州列榜地方所成立的共和黨，它之取用傑弗遜的政黨的名稱，可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時的民主黨，無疑地已經遠離了傑弗遜主義的理想，而林肯則對這些理想懷有崇高的敬意，這在他於一八五九年三月寫給波斯頓「傑弗遜俱樂部」的一封信裏可以看出。就是在這封信裏，林肯說：他同時信仰着「人」與「金錢」，但是在鬥爭的當兒，他信任人先於金錢。在林肯擔任總統的整個時期中，共和黨確是無愧於傑弗遜的政黨的那個光榮名稱。

現在且撇開那些最後成爲「第一」或「第二」黨的「新興」政黨不談，再檢視一下那些像流星般閃過政治長空而旋即消失的政黨的貢獻。這些政黨，大抵都是出現於一次大戰之後的政治及經濟的混亂時期，而它們大抵都會提出過一套爲控制着老政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不喜歡的建議。但這些建議中的絕大部份，隨後都被採納制訂爲法律，爲的是老政黨想竭力不使新黨得到立足的餘地。因之，使最基本健全的改革制訂爲法律的最可靠方法，也許就是着手組織新政黨。

## 勞工黨

在一八一二年之戰及拿破侖之戰後的物價傾跌及金融混亂期間，美國勞工第一次有了政治的覺醒；他們早期的努力，集中於費拉台爾菲亞、紐約及波斯頓等地。

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所出現的勞工政黨，最先提出了每天十一小時的工時制度，隨後

則又進一步提出了每天工作十小時的要求，他們要求以價值沒有波動的貨幣來償付工資；他們又要求不可因債務而將人關入監獄；最重要的是他們要求立刻停止銀行對信用的獨佔使用。當時他們還對安特羅·傑克遜表示懷疑，直到他於一八三二年下令取消了「合衆國銀行」<sup>(1)</sup>之後，才對他信任。當時是人們必須有了相當數量的資財才能担任政府職務的時代，工人們就要求中止間接選舉制。這些不同的勞工政黨在多次地方選舉中贏得了勝利，而他們所標示的方案又是如此健全而合乎人民要求，致令它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始終成爲平衡的砝碼。他們的建議的大部份，最後終被採納訂立爲法律。一八四〇年時房·波倫<sup>(2)</sup>能將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時間減少爲每天十小時，實是他們的一個偉大勝利。

而一世紀之前一切對於勞工政黨的攻擊，可說是一九四八年我們所將見到的攻擊的前奏。他們被譏爲反宗教，并且被斥爲與一個激烈到爲婦女權利及取消奴隸制而鬥爭的女子有聯繫。

在他取消了「合衆國銀行」之後的一個短時期中，傑克遜曾把大多數工黨人物網羅在民主黨之中。但是他們的愉快并未維持長久，因爲不久之後他們就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民主黨內的保守份子太多了，而且州銀行也與「合衆國銀行」同樣值得攻擊。在紐約，他們曾先試想控制「頓沫萊社」<sup>(3)</sup>，當這一試圖被證明爲不可能之後，他們就與民主黨分手了，而在「平權黨」(Equal Rights Party)的名義下，他們攻擊着獨佔主義，主張以集體談判來提高工資，並終於使三位他們的自己人當選爲參議員。

頓沫萊社的份子攻擊平權派，說是因為他們分裂了進步份子的選票，才使威格黨<sup>①</sup>得到選舉勝利的。而平權派的反擊，則是說他們看不出「國家銀行的威格黨」與「州銀行的民主黨」之間有麼什差別。

即使在傑克遜執政的全盛時期，勞工們即已在教育着民主黨，使他們知道勞工的支持並非唾手可得。當一八三七年的大恐慌——幾乎與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同樣嚴重可怕——來到時，勞工們在游行時所舉的標語，可同樣適用於一九四八年：「麵包、肉類、房租、燃料——它們的價格必須下降！」

在一八四〇年的選舉中，由於一八三七年時可怕的經濟恐慌，威格黨是註定要得勝的，他們把他們的候選人標為不主張削減工資的「窮人之友」。在當時，「平權派」（即通稱激進黨人——Locofocos）已暫時促使二黨都接受了他們的哲學。可是當房·波倫以採用自由主義的政策而向勞工低頭的時候，反動份子則又斥責他為已向「可恨的激進主義（Locofocism）魔鬼投降。」

### 共和黨

在一八三六年之後，當民主黨在奴隸制及勞工問題上，日益讓步於反動勢力的時候，民主黨已日趨腐爛。勞工們日益清楚地感覺到，奴隸制一日存在，他們自己的地位就危殆一日，勞工們看到他們所以每天祇能拿到一角錢的工資，完全是奴隸競爭日益加強的結果。因之，勞工就成為組織新黨——即共和黨——的一個强有力的因素，這一新黨，在開始時是以結合傑克遜主義與激進黨人的平權主

張，並且堅決反對奴隸制的立場而出現的。保守的報紙對新黨橫加攻訐——這是保守報紙的一貫的更是迄今還在繼續着的作風——但勞工們反而給它以更大的支持，特別是當林肯在一八五九年發表了一篇聲明之後；而這篇聲明如果拿今天湯麥斯——倫金<sup>(\*)</sup>的標準來衡量的話，則是十足的共產主義的。這篇聲明說：

……資本是勞工的成果，而且，要不是先有了勞工，資本是根本不會存在。勞工可以沒有資本而存在，資本沒有了勞工，就決不能存在。因之，勞工是較高的……遠高於資本的。

其後，爲了報答一八六〇年時勞工之投票選他爲總統，林肯也給予他們以極大的信任。

可是，共和黨之作爲勞工政黨，爲期並不長久。到一八六九年時，麻薩却斯特的勞工，對它已深痛惡絕，乃有溫台爾·非利浦 (Wendell Philip) 及其朋友們所組織的勞工改進黨 (Labor Reform Party) 之出現，並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及女工同酬的要求。

然後，到了七十年代的早期，一個典型的戰後大恐慌橫掃大地，使農民陷於破產，使職工會趨於毀滅；大公司大資本則攫得了大權，在政府的偏愛照顧下，獲得厚利。這些大公司，特別是鐵道公司，同時剝削着農民及工人。當時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反獨佔」，到處的農民都痛恨着華爾街及托辣斯。

起初，他們還想在共和黨及民主黨內部發生作用，但是在二黨中，特別是在州級黨部中，他們發現到鐵道及金融寡頭早已是根深底固的了；要展開行動他們必須另行組織新黨，因之在整個美國，發

生了一陣在各州內分別組織新黨的大風暴。其中若干並且終於獲致了州政府的控制權，但他們終於認清楚祇有以全國範圍的聯合一致的行動，才能予惡魔以致命的打擊。他們要求控制鐵道，制定聯邦所得稅，並控制金融制度，以使債台高築的農民不致被驅入破產之途。

### 綠背黨

隨後，若干州的此種努力，終於匯合成爲綠背黨的運動，該黨於一八七四年在印第安波里士號召「樹立一個爲人民、屬於人民、由人民發動的新的政治組織，用以抑制康拜因資本對人民大眾的權利及利益的侵略，以減低稅率，糾正腐化並整肅政府的所有部門。」

在內戰期間，政府被迫脫離了金本位，而紙幣一度竟祇值到金幣價值之半。那些曾出資供應戰費的銀行家，需要增加他們所握有的公債券的購買力，他們要求政府以金幣而不以紙幣來償債。而農民則要求有更多的貨幣流通，不論是印刷機製造出的紙幣，或是自由鑄鑄的銀幣。

起初，綠背黨並沒有得到勞工的支持，而僅僅獲得貨幣理論家及中部西部的押地農民的支援。一八七七年鐵道大罷工的強大壓力，才使勞工們震驚於他們的戰後危機。當勞工與貨幣理論家匯合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在一八八〇年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競選運動，其政綱是要求有一個遞增的聯邦所得稅、對州際貿易由議會加以規定限制、以及婦女選舉權等。如果一九四八年的新政黨也能如此正確地估計到將來的需要，我將感到非常愉快。

## 平民黨

對於華爾街之控制民主共和兩黨，第一次真正進行攻堅戰的農工政黨，在一八九二年七月誕生於納貝拉斯加的奧瑪哈，該黨名稱是「平民黨」(People's Party)，它也是往後在溫特羅·威爾遜及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開花結果的許多優良觀念的溫床，在保守報紙的普遍譏嘲下，他們主張穀類貸款、白銀之自由鑄鑄、鐵道、電話及電報之收歸國有。

克利夫蘭及其民主黨，會追隨着一個激怒平民黨人的反勞工政策，但是，當一八九四年時共和黨參議員改選中獲得大勝利之後，民主黨就決定還是轉為進步的好。

在一八九六年時，民主黨實際上容納了平民黨人而提出了大部份平民黨的理想。由於平民黨的運動，南部發展得異常強大，在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年間，在南部就有十州先後通過了人頭稅法，藉以剝奪掉黑白二種窮苦人民的選舉權。這一措施，直搗平民黨運動的心臟，並使南方的民主黨人成爲極端反動份子，而永遠造成了民主黨黨格的分裂。

## 牡蠣黨

一九一二年時西沃圖·羅斯福所領導的牡蠣黨，是建立在人的而非觀念的基礎之上的。它使用了白里安及平民黨的「語言」，並以最大的熱誠談論着「反托辣斯」。「羅斯福」這一名字，是有



其驚人的號召力的，但以前的平民黨人却并不輕予信任，大多數進步份子，都投票選舉威爾遜。威爾遜是必然會贏得勝利的，即使沒有西沃圖來分裂共和黨的選票。

牡蠣黨的主要價值，是在於它表達了共和黨的進步主義，而這一進步主義，自林肯去世之後，就一直在冬眠狀態中被擱置不顧。數百名在一九一二年為西沃圖工作而獲得其初次政治經驗的人，後來都以更大的熱誠於一九三二年時為富蘭克林·羅斯福而工作。富蘭克林本身，無疑的是曾受到西沃圖的極大影響的，而我個人更相信，要不是牡蠣黨曾在一九一二年時為控制大公司而進行鬭爭，那末「新政」的整個道路，就將完全不同。

一九二四年出現的拉蕩萊德 (Robert La Follette) 的第三黨，雖然並沒有獲得跟牡蠣黨同樣多的選票，但它的意義更為深長：它在二大舊黨同趨落伍的時候，使進步主義的火箴得以燃燒不熄。拉蕩萊德的為勞工而努力的立場，要比西沃圖的堅強得多。一九二四年時他在克利夫蘭地方的進步大會上所發表的政綱聲明的演詞，其中有好幾點可以完全適用於今天。他說：「……我們都不信兩黨會遵守它們的諾言。兩黨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對於他們的政綱，正和今天一樣，并不看作為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和行動的方案，而是用作奪取選票，獲致官職的手段，并給予甘願出賣人民的信託的人許多升官發財、謀求私利的機會。打破私人獨佔資本對美國人民政治及經濟生活的聯合控制，是一九二四年競選中最主要的論題。」

今天，我們祇要把這段話中的「一九二四年」改為「一九四八年」，并把「美國人民」改為「全世界人民」就可以了。

拉蕩萊德特別把當時反共專家民主黨檢察長密却爾·派爾茂 (A. Mitchell Palmer) 列出來作為攻擊的對象。「在民主黨政權的最後幾年中，在檢察長派爾茂的可惡的統治下，獨佔資本是被認為超乎法律權限之外的，而將那些敢於反對這一暴君統治而要求保障憲法權利的職工會、農民組織以及個人等，標列為攻擊與毀滅的對象。在一九二〇年時，美國人民曾以美國歷史上從所未見的壓倒多數的選票使民主黨敗陣而去，用以表示他們對於在民主黨統治下之被出賣的無限憎恨」。

在斥責了民主黨之後，拉蕩萊德又轉而抨擊共和黨現政權之腐敗，并總結說：「掌握全國鐵道的所有權、控制着信用、并支配着國家工業命脈的有組織的金融集團，如果我們容許他們繼續控制政府的話，他們將更進一步地壓迫勞工、剝削消費者、并以高昂的鐵道運費及對貸款條件的獨斷，而使農業生產降低到歐洲的水準。通過對美國資源及人民的剝削而獲得的不義之財的剩餘資本，造成了帝國主義，它吞沒并剝削外國的自然資源與人民，樹立大規模的軍隊以保障它的海外投資，培養為奪取世界市場的國際鬥爭，最後將無可避免地引向戰爭。……」

「要想依靠一個由只知道強權不知道法律，並且貪婪於戰爭所產生的龐大利潤的獨佔資本集團所

選擇所控制的總統及議會，來減削我們的軍備費用、去訂立縮軍條約、或是採取任何保障和平及國際間的善意的行動，那完全是癡人說夢。」

對於鮑勃·拉蕩萊德，和平是太重要了，因之，他在結語中說道：「應該推動各國訂立堅實的協定，以消滅戰爭，禁止征兵，大量地削減地面、空中及海上的軍備，并保證人民對於和平或戰爭的最後複決權。」

無疑的，這一進步運動，較諸牡蠣黨的運動，要健全得多。西沃圖本身是個空談家，并且有時還是個帝國主義者；但鮑勃則懂得國內的進步主義與國際和平之間的關係。

無數在一九三二年為羅斯福工作的新政份子，就是一九二四年時的進步份子，而如果拉蕩萊德沒有在一九二四年時展開他的進步運動，那末一九三二年時羅斯福運動的力量就會大為削弱。在回顧歷史時，我要譴責鮑勃的祇是：他不在一九二〇年就開始他的進步黨的活動，而到一九二四年時方才進行。最重要的是：必須在一個嚴重的恐慌到來之前，就先有一個「活躍」的政黨。

### 教訓

作為這一對第三黨歷史的簡短分析的結果的，是使我較前愈益深信：第三黨運動的意義，實遠較已為今日大多數出版物所承認了的意義更來得深長，而這一點，對於在一九四八年展開新黨運動，是極為重要的認識。

而且，如果把今日國際局勢考慮在內的話，處在我這樣地位的人，祇能得到一個結論：必須竭盡所能以使得一九四八年的新黨，較諸過去的所有的第三黨，具有更多的意義與價值。心臟衰弱的「自由份子」，已經離開我們而他去了，現在我們已準備着手建設。（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新和共」）

（註一）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是一七九八年時所制定的四項法律：一、外僑歸化之最少居住年限，由五年延長至十四年；二、授權總統在二年內可以下令驅逐任何危險的外僑出境；三、規定在戰時總統得下令驅逐或拘捕外僑；四、規定凡圖謀反對政府措施或批評官吏者，均為重大犯罪行為。

（註二）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此為美國國會於一七九一及一八一六年先後核准設立之銀行，營業期限各為二十年，業務為承受公庫存款，對政府貸款，代理稅收並發行紙幣。一八一六年設立之銀行，遭受州銀行嚴重反對，主張到期不予延長，乃成為一八三二年競選之重要論題之一。傑克遜亦主反對，後傑克遜當選總統，該銀行遂於一八三六年停辦。

（註三） Martin Van Buren, 係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一年美國第八屆總統。

（註四） Tammany Hall, 為民主黨中之一派，以一七八九年創立於紐約之蒙哈頓。

（註五） Whig, 通譯「自由黨」係與民主黨對立之政黨，存在期為一八三二至一八五六年 其間曾上度獲勝，澤田赫立遜（一八四〇）及泰勒（一八四八）為總統；至一八五二

年競選失敗，一八五六年和黨代之而興。

(註六) Thomas Rankin, 係指一九四五年一月間改組成立之「非美國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的二位負責 J. Parnell Thomas 和 John E. Rankin。該委員會在獨佔資本之指揮下，藉反共之名而行摧殘人權壓縮民主之實。

(註七) Greenback Party, 亦稱獨立黨，創立於一八七四年，活躍於一八七六至一八八〇年之二次大選。其主張為反對收回內戰期間所發行之不取黃金聯繫之紙幣。

(註八) Bull Moose Party, 亦稱「進步黨」，為西沃圖·羅斯福所領導，因羅氏自覺為一牡鹿，故有此名，後又以「牡鹿」為該黨標記。

(註九) William Jennings Bryan, 美國政治家(一八六〇——一九二五)

## 我的世界復興計劃

在華萊士宣佈爲總統獨立候選人之次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威斯康辛州的

密爾華基發表演說，提出了一個世界復興計劃，以替代反動的馬歇爾計劃。一九四八年二月二

十四日，華萊士又在美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上發言，所提出的世界復興計劃，要點與本文相同。

昨天我宣佈了在美國將有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同時我又宣佈，爲了這個目的我將以獨立的身份，在一九四八年參加總統競選。

我的這一最後決定，主要的是爲了要給予美國人民以一個選擇和平與安全的投票機會。我恐怕早在去年三月杜魯門提出給予希土二國以軍事援助的時候，事情就已是註定了的。在一九四七年中，所有我們的對外援助，一直都是以反蘇爲精神，而不是以援助饑饉的人類爲目的。軍部、華爾街的喉舌以及國務院始終在對美國人民進行着心理戰爭，要使他們盲目於這樣的事實：我們的片面的對歐援助，干涉了幾乎每一個西歐國家的內政；普通的歐洲工人都把它當作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以希臘的事例而言，甚至較帝國主義還要壞；同時，今日的一「冷戰」終將引起炸彈和越過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遠征。

在這一足以促使我們陷於道德與金融的全面破產的瘋狂政策下，希臘人民可算是最悲劇性的受害者

人了，我們的第一批貸款已給用光，希臘孩子却還在哭着要奶；一方面，美國訓練的希臘軍隊則舉着游擊隊員的首級在通衢巡行，貪污腐化的政府則又下令宣佈了合法的工會活動的死刑。全世界的人民應該有機會看到：除了那專在全世界範圍內污辱美國民主的信譽的、以杜魯門為領導、由華爾街所支配、持軍部為背柱的集團之外，這裏還有另一個美國。

馬歇爾計劃在剛發表時的最初講詞，在我聽來是很好的。諸如自助、互助以及美國的支持等等原則，都與我在幾次不同的場合中所提出的建議相同。而現在，則差異已是異常明顯的了，這更是極其重要的差異。當馬歇爾計劃初次宣佈的時候，我就聲稱必須去掉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才有其意義，但今日杜魯門主義並沒有被廢止。以杜魯門主義作為心臟，所謂「歐洲復興方案」，祇是一個對接受援助各國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諸方面橫加干涉的計劃。我們在說：「如果你們建立了跟我們一樣的政府，並把你們的經濟隸屬於我們的經濟之下，我們就給你援助。」

我們已在希土二國化了四億，在中國化了二十億，並在我們的武裝部隊上化了二百五十億，用以支持一個引向戰爭而不是引向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們力能投資於歐洲的復興，但是我們的政策毋需以百十億金元的軍火和百十萬人員的軍隊來作為支柱。

我們不能以軍備的威力或是對不民主政府的支持，來阻遏西歐的共產主義或是其他任何思想。「兩黨外交」已經使美國人民跟君主、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反動份子結成了聯盟。

在「冷戰」上，蘇聯當然並不是一無過咎的。但是，即使我們接受了一切對蘇指責，却並不就是寬恕了一個與美國原則相背馳的政策。

一個實際的政策，必須以對聯合國的真誠支持為開始。我們會漠視了聯合國，我們在「緊急」的名義下予希土以軍事援助從而陷害了聯合國，我們扼殺了把歐洲引上復興之路的「聯總」，我們繞過聯合國而提出了馬歇爾計劃。我們必須重申我們對聯合國的信念。如果世界上這一最強大的國家撕毀了世界組織的原則，並且又出以直接毀壞這一原則的行動，那末聯合國就不可能得到成功。我們不能一面奢談下天下一家的理想，同時却運用我們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來把這天下一家分裂為二個世界。

當對援歐的必要幾乎已是一致認可的今天，那已是轉為「實際」的時候了。

如果說我們排斥了目前所建議實施的那樣的馬歇爾計劃，這並不是說我們並沒有另一套計劃。我們所建議的是一個足以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以世界的團結和友誼為基點的計劃，而不是一個散播戰爭的種子，以世界的分裂和鬥爭為基點的計劃。我們所建議的，是一個真正實踐去年六月間馬歇爾在哈佛演講中所說的好的字眼的計劃，——而不是一個在實際上與這些言詞相矛盾的計劃。

聯總的經驗證明了這樣一個計劃是可以實踐的——也就是說這樣的計劃是可以發揮其作用的，這一經驗，更確實說明了祇有這樣一個計劃，才能為和平——不是為戰爭——而出力。



在過去十五個月之中，我會一再提出過這樣一個計劃的重要內容，現在且再簡單而具體的複述一次：

一、我的計劃，主張由美國向聯合國提出建議，做照「聯總」的型式設置「聯合國復興基金」，用以復興並重建歐亞二洲一切為戰爭所摧毀的土地，其目的在於促使他們的工業與農業恢復生產，並儘速使他們立足於自給自足的基礎之上。

二、我建議這一復興基金應由聯合國專設機構加以管理使用。

三、復興基金由美國議會所通過的撥款及其他力能謀的國家所捐出的款項來構成，其數量應足夠支持一個全面援助的五年計劃。基金之使用，一部份得取貸款形式，一部份得取贈予形式。（按：華萊士於二月二十四日在衆院外委會發言時，建議設置五百億美元的「復興基金」。——譯者）

四、這一聯合國機構應致力於使在軸心侵略下受害最深最慘的國家，優先享用基金。基金的分配，必須單單嚴格地基於需要及貢獻的考慮，而根本不管受助國家的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的性質。

五、聯合國機構之分配基金，應嚴格而審慎地尊重所有受惠國家的主權。對於貸款或贈予，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或經濟的條件。特別是，聯合國機構決不能以指定依從一個特定的全面經濟計劃，作為援助的條件，而必須一任每一國家自由去發展各自的國家經濟計劃。援助不應對被援國家的已存的或新創的企業之發展加以任何限制；也不應企圖以對經濟之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加以任何限制作為援助的代價。此外在尊重主權的前提下，應規定所動支的基金，決不容許被浪費於貪污與無效率之中，

同時，費用的支付，應接受聯合國當局的查核，以根絕貪污與無效率。

六、全部基金，應絕對使用於和平目的，一文錢都不能使用於購買軍事供應、軍火、或任何其他軍備。

七、最後、魯爾區域的德國工業心臟，必須置於四強所管制的國際機構之下，以使得：第一、當地的資源可被應用於協助歐洲的重建；第二、保證德國將永不能再處於一個力足以威脅其鄰邦的安全或世界和平的地位。

爲了全世界的和平，這些都是極其必要的，這一全世界最大最富最强的國家，力足以担負起這樣一個建設性計劃的領導責任。同時，我們還必須領導起一個縮軍方案，這方案將禁止一切大規模的破壞方法，並促使全世界的工農力量，全部應用於創造我們的資源、科學及技術的豐足。

一個健全的，有原則的外交政策是必需的。不僅如此，我們應該設置於外交關係中的忠誠的表現，還得以在國內的强有力的行動爲支持。我敢預斷：除非我們對於外國重建的投資，是以控制膨脹的健全的國內計劃爲支持，我們將見到孤立主義的可怕的復蘇。對於希臘、土耳其以及中國的援助方案，已經激起了對國外援助的嘲笑與譏諷。祇有一個世界一家的和平投資政策，才能贏得美國人民的繼續支持。如果不能保護工農及消費大衆，免於擴張軍備及不健全的國外投資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的災害，那結果將是够悲慘的。

除了國內應有一個健全的經濟計劃之外，作為我們新外交政策的支持的，還得有充分而具體的表現，以證明當我們說到美國「民主」的時候，我們的確是言行一致的：

各式各樣的「基姆·克羅」●必須完全廢止。

人頭稅及其他對選舉權的限制必須廢止。

人權自由必須恢復並予以保障。

美國民主的優良信譽，必須加強。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決沒有容許封建主義繼續存在的餘地。我們必須中止華爾街對南部與西部的殖民地化的統治。

這些措施，都是必須的，不僅是爲了美國的福利，同時更是爲世界和平的締造。

當我們在美國國境之內，堅持執行不民主的措施時，我們是騙不過全世界的人民的。華爾街的人們發現到運用人道主義的字眼，是便宜而有利的，但全世界的人民却洞悉他們的紀錄。他們知道這一批人曾反對每一種促進國內健康、教育、社會安全及人民福利的建議。如果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美國民主的優良信譽，軍閥財閥必須被擯斥於今日他們所據有的統治地位之外。我們今天所傾力以赴的，就是這一條道路。

每當羅斯福出而競選總統時，千百萬進步份子都投票支持他。而保守份子及反動份子，則從一九三二年起直到一九四四年止，始終投票選舉共和黨候選人。直到我出而宣佈爲獨立候選人之前，曾四

度選舉羅斯福的美國人始終找不到一個在一九四八年投票支持的對象。我們將永不與反動勢力妥協。我要求全美國的進步人民——你們構成了美國人民中壓倒一切的絕大多數——在一九四八年以及以後的每次選舉中，都為進步與和平而努力、而投票；我要求你們應徵服役於這一反特權、反獨佔、反貧窮的戰鬥；我要求你們參加爭和平的戰鬥。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一九四八年是你們挺身站立起來作一個人的第一次機會。我們將終我們一生繼續奮鬥。我們將贏得勝利。

全美國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上次大戰的結束，將開始一個進步的發展的新世紀，這一希望，已被那些反對進步以及與反進步的勢力相妥協的人們所毀壞無遺。在大戰期中，我們會說：「在上帝之前宣誓，我們為人民而戰鬥的人，在這一目的達到之前，我們決不中止戰鬥。」

這目的，到今天還沒有達到。我們正繼續在戰鬥——其實，我們的戰鬥，還剛在開始。

(註) Jim Crow, 係指美國重建時期以後，南方各州及各城市所通過的各種隔離黑白人種的社會生活，及阻撓黑人爭平等之慾望的法律。本來這些法律祇用於火車旅行及其他舟車交通，但不久後即擴大為禁止黑白通婚，及學校、飯館、旅邸、工廠以及其他公共場所的強迫隔離。

## 兩黨聯合與兩國聯合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國貝文外長在衆議院發表演說，號召組織包括英、法、荷、比、盧等國及其海外屬地以及北歐諸國的以反蘇爲主要任務的聯盟。這一演詞，博得邱吉爾及馬歇爾的同聲贊美。華萊士特撰文指斥這種戰爭叫聲的陰謀。並號召由美國人民來決定和戰。

以賭棍在盲目賭博中作孤注一擲的拚死精神，英國二大政黨的巨頭，正聯合着美國二大政黨的巨頭，以瘋狂的速度向前猛衝。他們叫囂着要立刻攤牌。

今天邱吉爾是够愉快的了，因爲他把今日的局面，認作爲二年前他在米蘇里富爾頓所發動的那種勢力的結果；如今，貝文外長與美國的國務院，已把他的建議，實踐爲西歐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聯盟。他認爲他在三十年之前所發動的獵熊戰，將急轉直下地得到驚人結果。幾年以來，他一直在爲實踐其以英法同盟及西歐聯盟爲輔的英美同盟的夢想而工作着，他一直堅信着由盎格魯——薩克遜管制的原子彈教區。現在，俄國前來皈依的時機已經來到，不然她就無路可走。

上一次邱吉爾自以爲已把巨熊迫到死角的時候，是一九一九年的冬末，當時比爾·布立德（Bill Bullitt）帶回列寧的建議，這將使蘇聯在中央俄羅斯僅僅保留少量的土地，可是邱吉爾却說「不」；

他正和勞合·喬治聯合了克里孟梭從事於以武力推翻蘇聯的計謀，甚至連威爾遜也是同謀。他們都認為祇要把武器及軍火供應白俄將軍，就足以扼殺那可恨的新政府。可是，戰敗的結果，終使蘇聯得到了較當初列寧自願接受而為邱吉爾拒絕允准的面積超過了好幾倍的土地。而後就由這一形勢，肇始了那引向第二次大戰的動力。

在今日小心策劃着的謀略中，第一步驟便是由美國國務院發表所謂「希特勒——史太林祕密協定」。

在一九三八年會願意支持捷克的史大林，却終因英法兩國在慕尼黑的表現，而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英法兩國的興趣，不在於阻遏希特勒，而在於抑制蘇聯。根據他過去所累積的經驗，他簡直無法得到傍的結論。

這次所發表的那些文件中，並沒有透露出什麼新的東西，祇是強調提出了那衆所週知的蘇聯對獲得溫水海巷的期望。今天如果能讓史大林重做一遍的話，那麼根據他對希特勒、法國以及英國的新的知識，他所將做的事情，簡直不會跟他已經做過了的事有什麼不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的最高興趣，總是在於保存和平，保全蘇聯。

在國務院的「揭露」像潮濕的爆竹那樣洩了氣之後，貝文就挺身出來提出了聯合起自中東、包括非洲以至斯干底納維亞所有國家的建議。提到中東時，他說：「我們和阿刺伯有着歷史悠久的友誼，我會一再向美國及蘇聯提起過，中東是世界和平的一個極主要的因素；並且，也是不列顛帝國的生命

線。┌

他沒有提到與中東猶太人民的友誼，而單單說到與伊朗政府之間的防禦計劃。這可能是以蘇聯為假想敵的，却又不得不令人懷疑到：如此瘋狂反猶的伊朗人民，是否會拿起英國的武器轉而進攻巴力斯坦的猶太人。

在貝文發表演說的次日，邱吉爾及美國國務院就異口同聲地加以贊揚。從現在起，這一類事情將不斷地經常出現，以用來使得美國人民特別是議會急急於給予馬歇爾及海陸軍部以他們所要求的每一文錢。總之，諸如此類的事件與消息，是被創造出來應用於一個特定的目的：促使盎格魯薩克遜人民及西歐人民，在蘇聯不予滿意答覆的時候立即採取攻勢。

而最最危險的一點是在乎邱吉爾之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必須立即攤牌。自然，美國的民主黨是希望在今後十個月之中，能繼續不斷地使事態趨於極端的。他們以杜魯門來贏得選舉之唯一可能途徑，就是使戰爭就在前面。民主黨中的一位高級人員最近曾說：「新黨運動在二個月之內就會銷聲匿跡的，因為我們的外交政策正日趨固定。」

我有一位住在國外的交往最深最久的盎格魯薩克遜的左翼友人，最近寫信給我提到新黨運動：但是，假如在今後六個月之內，當你看清楚推行着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共產黨，是着眼於征服所有的非共產主義社會，也包括美國在內的話，你又該怎樣呢？在這一情形下，你當然會棄却你的新黨運動，並號召美國人民——無論激進的或是反動的——一致作為現政府的後盾，以面對戰爭的危

機。如果俄國不要和平，那美國將被迫採取戰爭的道路。

但是誰說蘇聯不要和平呢？在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那篇文章中，約翰·斯坦培克也沒有這樣說，而且恰巧是相反。但就在同一張報上，我們却看到陸軍空戰隊的柯依拉上校在呼籲：總統應有權隨時發動「防預戰爭」而無須事先取得議會同意。

我說美國人民應有辯論和戰問題的權利。如果在一九四八年我們被剝奪了這一權利，那我要說：我們已經處在一個軍事狄克推多的掌握之中，而今天也是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明白認清這一事實的時候。像邱吉爾一樣，我也堅持促使事態立即攤牌；我要就在國內攤牌。我要知道在蘇聯拒絕從邱吉爾的最後通牒的情形下，我們是否就將參加一次對蘇的原子彈戰爭。（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新共和」）



## 美國的軍國主義化

杜魯門之提出普遍軍訓法案，以及合併海陸空三軍部的國防安全法案之通過，一般人都祇就其表面意義加以批評，華萊士則進一步指出這一切不過是美國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具體步驟之一。在本文中，華萊士以討論國防安全法案為開始，揭露法西斯主義在美國迅速成長的真相，指出了獨佔資本家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全面控制，以及對國外擴張的積極從事。

在一九四八年的競選中，主要的論題之一，將是美國的軍國化問題。儘管「普遍軍訓案」本身是極其重要的，它却祇是一種更為嚴重的病症之皮相的表現。這一病症，就是那為控制着經濟命脈、支配着大多數人民的思想與感覺的獨佔資本主義而服務的軍事法西斯主義。雖然它是在幕後行使的，而且表面上還有着主要地用作片面宣傳的新聞、廣播以及電影攝製的自由，這種控制，仍然是異常真實的。

我對美國軍國主義的指責，還可提出事例來證明。在羅斯福總統逝世之後，軍部勢力立即進而攫奪對政府以及國家的全盤控制權，他們的成就究有多大，可自「國家安全法案」中看出，這一法案的意義，遠在單純地合併海陸軍之上。福萊斯德部長對該法案的解釋，是極其真實的，他說它促成了「國家所有部門而不僅是海陸二軍部的配合一致。……它完成了軍事三部門的合作，但在我看來遠為

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以及國民經濟與軍事要求之配合一致。……」

爲了避免強硬的外交政策缺乏有力支持的危險，福萊斯德的辦法是：「我們已致力於以建立國家安全院來掃除這一危險。這一由國務卿、國防部長、軍事三部長以及全國安全資源局主席等人所組成的機構，使得我們在外交政策、軍事政策、國防資源與生產能力各方面獲致實際可行的協同一致與分工合作。」

這一全面軍國主義化的華爾街計劃的精神，也就是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查理·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在 1934 年的 *Army Ordnance Journal* 上所提出的精神。威爾遜說：「這一思想，也許是并不愉快的，但事實是幾世紀以來，戰爭一直是人類進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也許我們應該排斥「戰時經濟」與「平時經濟」的虛偽詞藻。……首先，這樣一個方案，應該是聯邦政府的責任。它應該由行政部門——由作爲海陸空總司令的總統，以及海軍部與陸軍部來創導並執行。在稍次的一級，很明顯的，商務部與勞工部也該是有關係的。」

「同樣重要的一個事實是，這必須是一個一勞永逸的、繼續存在的方案，而不是個臨時性的緊急措施。這一方案，在開始時，必須由議會以決議案甚至立法案來加以保證並支持，其後，更得予以規律化的有計劃的、持續不斷的撥款。……對於工業，則不應使其受到政治整肅的阻撓，或者把它擲入標上了「該死的商人」的標誌的幻想的孤立主義的園地內。讓我們促使這一工業、政府、軍事的三角合作，成爲永久可行的部署，而不是權宜之計的應急安排。」

這一方案的對外貿易部份，則基於這樣一個觀念：由自由企業據有並管理出口機構、進口機構以及國內外的生產機構，而由政府來負責保證並保護私人機構在全世界的貿易權利。

國務院是保障私人企業的世界貿易權的最前線。但是，對於美國世界貿易的推進，更為重要的却是國家安全院之以其超越一切的權力，促使所有我們的力量集中於軍事目的。誠如國家安全法案最堅決的支持者之一的參議員奧斯汀 (Austin) 在他作為美國的和平代表去參加聯合國會議之前所說的：「在所有的談判中，現在所已承認的唯一力量，就是軍事。」

我要指控：杜魯門、馬歇爾、福萊斯德（以及他的三個部長）、奧斯汀和哈里曼（以及他的工業武士們），對於國家事務都抱有這樣一種態度，即把戰爭準備認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也因之，就把它視作為最高形式的公共福利。

在所有歷次大戰爭之後，已出現了一種壓倒一切的趨勢，即是戰勝的國家接收了戰敗國家的最顯著昭彰的罪行。這一趨勢，沒有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後的美國，表現得更為明顯的了。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如此迅速地採取了走向集權化的普魯士官僚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堅決步驟。我們且已超過了這一階段而情願從事毫無藉口的進攻。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間，紐約時報的傑姆·李斯頓 (James Reston) 即報導說，在所有獲得了「普遍接受」的「初步結論」中，有一個意見是說：擬議中的一元化的國防機構「必須在心理上及軍

事上，先發制人地取得合法化的裝備；如果可能的話，應不與憲法相碰觸，如果必要的話，則應該修改憲法。」

李斯頓又說，對於在軍事部門與國務院及司法部之間建立「更外密切、更外富有進取性的關係」之需要，以及對於在「聯合內閣與議會委員會之間」的更緊密之關係的需要，已有了初步的協議。

安諾德將軍在他離開空軍首長的職務之前，曾宣稱：全體公民應該「團結於一個觸及國家生活與私人生活各方面的聯合努力之下。」他聲言：我們的安全，依持於「我們之以壓倒優勢的力量從事迅捷進攻的能力。」

對於先發制人的軍事組織在承平時期的影響，自由主義者的警覺性是非常遲鈍的。「美國新聞」(United States News)的保守的編者吉維·勞倫斯(David Lawrence)却早在二年前就已把握住了要點，他說：「武力的統治，在今天是凌駕一切的。杜魯門總統這樣說過，馬歇爾將軍這樣說過，柏德遜部長這樣說過。我們整個政府已在開始採用這樣一種哲學，即美國應該有一支龐大的陸軍、海軍與空軍。這爲什麼？……那該是因爲武力的哲學——而不是理性的哲學，軍事的表現——而不是理性的、公正的、自我抑制的言詞，已成爲至高無上的東西。這是希特勒爲德國的難關所找到的唯一的解救方法；他不信任其他國家，現在，我們也在開始不信任其他國家了，並且建立了一支武裝部隊來代我們在世界發聲。軍國主義已開始迅速地滲進了我們的民主制度。……」

在另一篇較早的社論中，勞倫斯說：「給予一個不向人民直接負責的人以控制海陸空三軍的全

權，那無異是倒撥時鐘，並在我們中間培養軍國主義的疑忌。職工會的工人們是否會坐視這種也許有一天會衝潰同盟罷工的陣綫的官僚制度的形成？自由主義者——包括教會力量在內——對於美國之進行那會給其他國家帶來災害的軍國主義的制度，是否會袖手傍觀？……基於已經見諸報導的材料，這計劃是够危險的；軍國主義的英雄色彩，似乎已被用來想把完全不適合於我們的歷史與傳統的軍國主義思想的制度，乘虛而入地贖混騙售給美國人民。」

由於國家安全院及其連帶機構國家安全資源局之建立，議會已毫不遲疑地結束了迄今為我們熟悉的那種型式的美國，而把她轉授給軍部以及那些一生都在為金融寡頭服務的紳士，和那些懷着驚人的安逸而來到華盛頓、並像變色蠟一樣地隨時接受了當時最便宜的政治色彩的工業家。

就是這些紳士們該為今日籠罩着全世界的對通貨膨脹、戰爭以及不景氣的恐懼，負大部份的責任。他們以恫嚇那飽受了戰爭破壞的蘇聯為賭博。當然蘇聯也像我們自己一樣的該受譴責，可是每當他們以航空母艦與海軍艦隊在地中海虛張聲勢，並大言不慚地喊着我們將到我們應該去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可意料到蘇聯會採取若干反擊的行動。當我們在美國批判蘇聯之排斥人權的時候，我們自己却正在跟蹤走上同一條道路。

我們之憎恨德國，是因為她自認為她是在「強權創造公理」的原始法律下，將德國的和平與文化帶給全世界的最適當的民族。而如今，在以華爾街與軍部為支柱的杜魯門手下，美國企圖以「強權創造公理」的主義，作為美國領導世界並支配世界的基礎。許多美國公民自認為他們自己並沒有責

任，但是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我們並非無可責怪。強權從沒有、也永不曾創造公理。

美國要領導世界，其唯一的道路，就是服務——幫助世界每一角落的人民的自助。我們現在的動作，促使世界每一國家的普通人民都對我們懷抱恐懼。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民，都認為世界之不能和平地修復創傷損壞，美國跟蘇聯實同樣有其責任。當二個巨人準備將劫餘的歐洲文化全部化為灰燼的時候，千百萬歐洲人民都在恐懼與顫慄中等待着。

這些人民中的大部份，都熱望獲得馬歇爾計劃所答應的援助，可是，他們對美國並無好感，因為他們相信在美國議會製造中的馬歇爾計劃，其目的主要的是爲了擴展美國的勢力範圍，以作爲反蘇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他們恐怕美國將以犧牲歐洲其餘部份爲代價，而扶植西部德國，使她能最有效地控制整個歐洲，並用之爲反蘇的堡壘。

祇要美國一日以杜魯門爲總統、馬歇爾爲國務卿、福萊斯德爲國防部長，美國就將一日以純粹的軍國主義的精神執行她的外交政策。而國內每一件措置，都將愈益是全力從事於使全國統一在戰爭體制下的國家安全院的態度之反應。新聞紙、廣播評論以及電影攝製將競爭着創造那爲國防安全院所需要的空氣。而那些出而表示懷疑的人，將被戴上「非美國」的帽子；那些沒有對蘇聯表示憎恨的人，每隔一二個月，就會被指斥爲賣國賊；而那些努力着作爲對蘇了解之橋樑的人，將被置於大法庭的調查之下。

這樣，軍事法西斯主義已在美國人民的不知不覺中偷偷地加到了我們身上。可是，桎梏還祇拷上

我們的腰部，我們還能自由行動。我們依然能够組織起來，而不會遭受置身圈圈的危險。

祇有在一九四八年投票選舉一個新的政黨，我們才能中止軍事法西斯攫取整個美國的攻勢；在過去二年中，他們已拿去了每一個目的物，現在，已輪到我們的機會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新共和」）

## 論塔虎特

由於塔虎特基於其孤立主義者的立場而對馬歇爾計劃、普通軍訓法案等等表示了柔弱的反對，美國反第三黨運動，自由主義者，就無的放矢地把華萊士誣蔑為「親塔虎特」的孤立主義者，希望藉此來打擊華萊士的威望。華萊士的這篇論塔虎特的社論，發表於他宣佈競選總統之前，可是自一月二十五日起在「下午報」連載的勒納（Max Lerner）的九篇論文中，還一再指斥華萊士與塔虎特的聯盟，誣指華萊士為孤立主義；而 Harper's 11月號中海倫的文章中，也提到這一點。

有好多次，我曾說過和平將是一九四八年競選運動中的一個主要論題。我的和平信念是如此其堅決，以致有幾次我甚至說：如果我們祇能在一個主張普通軍訓及援助國外反動政權的杜魯門，和一個堅決反對強迫軍訓及軍火外運的塔虎特之間抉擇的話，我寧願投票選舉塔虎特。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想用最有力的方式來強調和平之絕對重要性。

可是，我的這一句話，經過報紙刪去了那個重要的「如果」，讀到它的人就單祇接受了它的字面意義。爲了澄清誤解起見，且讓我率直地加一句：我決不會投票選舉鮑勃·塔虎特爲總統。

塔虎特之反對強迫軍訓，不是因爲他注意到這種訓練對於和平前途之影響，而是由於他反對增加



聯邦政府的費用。固然他確是不像其他幾個共和黨可能候選人那樣地激烈反蘇，但是，他還是堅決地贊同范登堡的「對蘇強硬」政策的，祇要范登堡能在不太消耗聯邦政費的條件下執行這一政策。

雖然在所有追求着候選提名的共和黨人中，比較起來他似乎是最不起勁於追隨那足以加強戰爭機會的、以武裝力量為支持的外交政策的，可是他的國內政策一旦施行的話，終將引致遍及全世界的不景氣，這反過來可又足以加深戰爭的危機。

今天正有着二種不同型式的共和黨候選人，其一是順從着亨利·魯斯的「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 的型式，另一種便是塔虎特。「美國世紀」型的候選人永遠相信着「共產主義的威脅」，手挾着機關槍，他從薩隆尼加一直奔到蘇州，武裝起每一個反動的堡壘。他以蘇聯支配世界的恐懼——這已被他的金融界及出版界的朋友們提高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為工具，以鼓勵起美國支配全世界的慾望。

在恐懼的藉口下，已化掉了百十億金元去武裝全世界以進行反共。但這為的是什麼？這當然不是為了人類的福祉。那些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以及一直阻撓着國內的社會安全、健康、房屋計劃和救濟事業的人們，今天却要求以遠多於他們願意用在美國人身上的款項，撥付出去用於軍備及對外援助。他們誰也騙不了。他們是爲了市場與利潤而鬥爭，不是爲了人類而鬥爭。

就是這些人，他們通過國務院而扼殺了「聯總」，繞過了聯合國而援助希土，并且忽視了重建破毀的歐洲的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帝國主義是個陳腐的醜惡的字眼，但是這些人的觀念也是陳腐而

醜惡的，因此那名詞對他們也就異常貼切。這些偽裝為反對「紅色威脅」的美國民主之衛士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所發生興趣的不是擴展人類幸福的範圍，而是擴展人類剝削的範圍。

這一集團，以及他們的總統候選人，在我看來是對美國最危險的一羣。根據我對今日歐洲的最直接的認識，我知道如果我們給予這一集團以無限制的權力，他們將為美國贏來全世界勞苦人民大眾的憎恨，而不是感激。固然這些人民對蘇聯也懷有恐懼，可是他們更清楚美國的動機不是在於人道的原因，而是為了政治的考慮，他們已厭倦於繼續担任兩大強國的貓爪。

對於這種情況，塔虎特是作為一個「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主義者而加以反對的。他唯恐聯邦政府對工商企業加以干涉侵擾，並且相信祇要我們政府不在海外從事什麼活躍的任務，這種干涉侵擾是可以被延攔的。正好像在安迪生(Addison)與史威夫特(Swift)的時代，在英國曾有「大英格蘭」與「小英格蘭」的爭辯一樣，今天我們正有着以塔虎特為代表的「小美利堅」派與以魯斯柔下的全體總統覬覦者為代表的「大美利堅」派。杜魯門總統恰與范登堡、杜威之流同樣地隸屬於「大美利堅」派的麾下的。作為一個集團，他們實際祇是個少數派，他們的真實意圖，在美國人民的心底是沒有地位的。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就決不願在美國擴展民主。他們將永遠致力於防止并反抗真正的民主輿論之進展。如果這一集團中的任何人竟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真可以說：「從沒有這麼多人受制於這麼少的人」。

我開始懷疑對於這批西班牙海盜式的「美國世紀」主義者，我們是否可以稱之為「反動份子」。他們並不是主張返回傳統中的什麼東西裏去，相反的却是一往直前地走向那將使十八世紀的不列顛帝國黯然失色的那種帝國主義。他們的「新法西斯」方案中的要素，是浩大的軍備、普遍軍事訓練、更少的民主，以及在保衛自由、民主和自由選舉的美名下，對其他國家的內政，加以僭越妄尊的干涉。

在全世界範圍內他們都在壓迫着人民的運動，以使得獨佔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的地位，在國內暨國外，都能得到安全。在他們從「新政」手中奪回了政府之後，他們已不再像塔虎特那樣的反對一個强有力的聯邦政府；他們正被誘惑及野心所鼓動而想建立一個強大而糜費的機構去統治全世界。

與「美國世紀」的冒險家相較，塔虎特可算是史前期的穴居人。他也偶然會緩慢地從那漆黑的洞穴中探出頭來享受一下帝國主義的美國的陽光；但是對於他，這實在是太昂貴的奢侈，因為在最後攤牌的時候，對他是真實美好的事情，祇是節省錢財與削減政府的職權，他反對過杜魯門主義，但是最後表決時，他又投票贊成對希土的四億元貸款。因之，在一九四八年，在試想減削少數美元之後，毫無疑問的他仍將投票贊成馬歇爾的援歐計劃。

真的，對於他的一小美利堅「主義，他祇將作柔弱的鬥爭，且極易於被擊敗。而最後，恰像哈利·勃特和湯姆·杜威一樣，他祇能談談「更高的效率」那一類話，結果也祇是東減西削地作一點

「小家子氣」的節省而已。

與歷史上的任何其他人物相較，塔虎特也許是最受到勞工憎恨的人。正好像「可恨的北鬼」(Dan Yankee)已在南方成爲一個專門名詞一樣，對於勞工，「塔虎特——哈特萊」也已成爲一個專用名詞。但是塔虎特的最高哲學，却仍能予他以立腳點。不像美國世紀的總統候選人一樣，塔虎特確是在美國的「過去」植有深根的。塔虎特對於各種問題之處理，是如此其通盤老式，以致對於小城市的小市民甚至普通的自由主義者，他較諸其他爲勞工所擁戴的人物，有其更大的號召力。

我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證明對於塔虎特的反對，不該僅僅以「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爲出發點，因爲他本身就代表一種真正的危險。他是一個較卡爾文·柯立芝更爲渺小、更爲消極的人。

在一九四三年時，他曾盡其最大努力把美國送回到「豪萊——史麻特」(Hawley-Smoot)時代的高關稅中去；他和其他六個參議員投票反對美國之參加聯合國，他投票反對對英貸款，并詆斥紐倫堡的戰犯審判，他更反對以民主、四大自由以及貸款擴展到國外。國內的消費者總該記得就是塔虎特，他曾扼殺了「物價管制局」而奠定了生活費用突飛猛晉的基礎。

長久以來，塔虎特主義一直在南部俄亥華樹有深基。所有的塔虎特們，一個又一個地發了大財；除了却爾斯·塔虎特之外，塔虎特們都堅信着這樣一種主義：國家應由富裕的人來治理，而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幫助富人。對於作爲今日參議員的這位塔虎特，可又該說句公道話，就是就房屋

及健康問題而言，他像是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但是，即使在這一點上，他還祇是在玩政治耍手段而已。（在他最近一次的「公共福利」的講詞中，他所提出的主張是：在三百億總預算中，用於他的房屋、健康、教育以及社會安全方案的總數，僅不過十億元。）而由於他的凌駕一切的「渺小」，他的大部份方案一遇到現實要求的考驗時，也就不攻自敗地崩潰了。

最令我不快的是，在我對塔虎特略為說了些客氣話之後，我發現到麥考密克上校竟認為塔虎特是個了不起的偉人，並且據說今天麥克阿瑟既已為他盡完了嚇退艾森豪華及杜威的使命，他已準備將支持麥克阿瑟的全部力量最終轉用來支持塔虎特。

我相信所有的美國人，不論是進步份子或是非進步份子都在為共同目的而努力，但是我們必須認清楚我們自己的目標，並看清楚別人的真正目的。我看不見我自己會在任何條件之下和塔虎特、麥考密克及麥克阿瑟輩那一流人合作，我不相信這樣一種聯盟——不論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會有助於和平，不論塔虎特是如何地反對普遍軍訓。

我們這一羣信仰和平、信仰天下一家以及提高全世界生活水準的人，不會信仰塔虎特主義或是美國世紀主義。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方案：通過世界銀行以低利率的自行清償的貸款，去促進全世界落後地區的生產，——這是為了人類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美國世紀」。為了推進我們的積極的方案，我們必須打倒塔虎特主義和美國世紀。我相信歷史將會證實我們的觀點之正確性。（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共和」）

## 人民說話了

自從華萊士宣佈以獨立身份競選總統之後，激動了全美國的人民，許多人自動應召爲第三黨運動出錢出力。這裏是華萊士所接到的人民投書的一部份。從這裏多少能看出一點所謂「美國民主」的實況以及華萊士運動的力量和前途。

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了，美國人民又對我發出了數萬封信件與電報。第一次發生於反動派展開阻止我就任商務部長的鬥爭的時候；第二次是我辭卸商務部長的時候；這第三次，是在我宣佈爲美國總統候選人之後。而這一次，是三次中最驚人一次，因爲這些信件，表明了一種更深沉的情操，更莊重的渴望，和一種想做些事的渴望。

在每一百封來信中，約有四五封是反對我的競選的，其中有半數是出於善意的，祇是懷疑於我所採取的步驟是否聰明。每一千封信中，有一封是強暴的，以運用暴力爲威脅，更有肆口謾罵的，甚至不惜出以污言穢語。但這些通常總是不署名的無頭信。

在來信中，最典型的是芝加哥一位女士的來信，她寫道：「我們芝加哥人是够不幸的，當你在芝加哥演講的時候，他們不讓我們聽到你的聲音。他們唯恐「我們人民」能聽到真理。這裏是我獻給你的運動的一元美金。你是我們將來的希望，也是全世界的希望。」

一位俄亥華的小商人寫道：「作為本鎮民主黨委員會的候選人，你可信託我將竭盡所能來協助你的競選。儘管目前民主黨及自由份子，反對着獨立的政黨，但是隨同運動的展開以及問題之日趨鮮明，你的主張一定有超越黨界的號召力。我更相信我們都將為意想不到的結果所驚倒。」

米蘇里的一位孩子說：「你該有興趣於我母親對你的競選聲明演講的反響。她是一個共和黨人，並且是相當堅強的一員，雖然她並不贊成塔虎特。對於你，以及我對你的崇拜，她的批評一直都是非常尖刻的。但是當聽完了你的廣播演講之後，我還靜坐着沉思，她突然從她躺着的床上跳了起來，一面說：「現在你知道我將幹什麼？我要去登記投票選這一個人。他真正說出了我心裏的話。」」

若干人民却毫不懷疑地相信我跟克里姆宮有着特殊關係。例如明尼蘇達的一位說：他曾做成了一萬種以上的草蓐的「子生植物」，希望我能替他弄到些特別的蘇聯變種。另一人則要求我幫助他使他的蘇聯夫人能夠離開蘇聯。這些人所不知道的是我根本沒有一位有勢力的蘇聯朋友，而且，當我把類似的請求轉到蘇聯大使館去以後，我從未得到過成功，而且據我所知，所有這些請求，從沒有得到過較為愜意的回音。够偶然的，我從未遇到過史太林，而且我也從未到過蘇聯的歐洲部份；可是寫信來的這些人，却假定我一生中會有大部份時間化在跟「政治局」打交道。

二個月之前，我會把帽子遺忘在紐約一家旅館的衣帽間裏，當我把它找回來的時候，却發現已有

人故意在帽子里邊刻上了這幾個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史太林贈於莫斯科」。

在全國的知名人物中，我確是最最堅持我們應該像了解我們自己一樣地去了解蘇聯的態度及其動

機。這是「恨蘇病」患者把我們說成蘇聯辯護人的全部藉口了。

費拉台爾菲亞的一位律師寫道：「我歡迎你之決定以獨立身份出而競選總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決定，而且祇會給我們國家帶來好處。從今天起，我將盡我的最大努力，以促使你自己，以及那些贊成你昨天講詞中所標示的和平政策的人員之選舉勝利。」

俄亥華的一位大學教授寫信說：「你曾被指為綏靖者及賣國者。這些都是可以由各種不同的定義的名詞。我不知道另外還有別人會對魔鬼及罪惡從事較你更鮮明更有力的鬥爭；非但遠不是任何偽裝的綏靖，你反而勇敢地向它挑戰，而且是在最難於也是最需要挑戰的地方——就在國內。你會堅決反對對國內反動份子的綏靖。至於說到賣國，最優良的也是可靠的保衛共和國的防線，並不在於職業軍人或是私人帝國主義者的機伶的計劃，而在於一個健全的外交政策。你已經接受到無數的斥責，但是最酷烈的還在後面。千萬別讓這些苦痛經驗，使你對普通人失却信心。」

我特別喜歡這位大學教授對於綏靖問題的強調，因為我恐怕他這樣地位的人，較諸我的綏靖蘇聯，更易於綏靖土生的法西斯份子。我既不為蘇聯，也不為共產黨說話，可是我仍然相信，那些把我與張伯倫並列的人，與那些在三十年代發動反共運動的人，是屬於同一類的。那時候的反共集團，產生了戰爭與苦難。今天的他們精神上的才遺，將產生一次更大的戰爭與更多的苦難，如果美國和英國的自由份子對他們綏靖縱容的話。



有位威斯康辛人附來了一張十元錢的支票寫道：「我們能够擊潰民主黨，然後反動份子將加入共和黨，那時我們就可接收民主黨機構，使它和第三黨溶和在一起，那我們又能恢復二黨制度：一個反動的共和黨，和一個人民的民主黨，那是一個爲和平爲人類的自由主義的政黨。我是一個退休的教員，但我依然能够去敲人家的門，跟人民談話，散發傳單小冊子，以及做其他事情。」

俄亥華的一位共和黨人來信說，除了一九一二年投票壯舉黨，一九三二年選諾曼·湯姆斯之外，他一直都投共和黨的票。他說我的競選聲明的廣播，迷失了主題，因爲我對生活費用的高漲，談得還不够。他是一個小商人，也是個寫作者，他感到了獨佔資本的壓力。「每一件事都獨佔化了，即使那會使我賺到些錢的地方——報紙——也不能倖免。今天要賣出一篇文章，與十年或十五年前相較，簡直比登天還難。如今什麼都辛迪加化了，你祇能在辛迪加所決定的時候，拿到它想給你的錢。自由企業——究竟在那裏？你告訴我。」

「在一九四〇年，我與我的妻子都爲威爾基競選寫宣傳品。今天，共和黨中那批腦滿腸肥的人，以爲不再需要我們了。我怕一九四八年該是對他們的當頭棒喝。我確信你能在一九四八年贏得勝利。我說這句話，是以我在正常的共和黨社會中所聽到的話語爲根據的。無疑的，那些「職業諷刺家」，又得忙一陣了，但你祇消記得馬克·海南(Mark Hanna)是靠了在選民前揮動一張畫着一只滿滿的飯桶的圖畫，而獲勝的。如果我能夠對你有用的話，請召喚我。」

一位西部本薛爾文尼亞的退伍士兵寫道：「我愉快於參加一次爲和平民主的新的運動」。

俄亥華的一位工會領導人說：他那工會的會員，將參加這一鬥爭。他深喜我把外交、軍事政策與牛油、雞蛋及肉類價格結合在一起。他以這一誓言為結語：「我願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贏得和平，使議會改觀，並把一位偉大的領導者送進白宮。」

本薛爾文尼亞的一位家庭主婦寫道：「我已不年輕，可是我又一次感覺到我正在出去敲人家的門，找人出來投票。你的演講使我們充滿了一種新生的希望、力量與勇氣。你將被報紙罵得體無完膚——羅斯福也會受到過的；你將被斥為共產黨走狗——羅斯福也會受到過。但是我們，我們人民，從一九三二年直到一九四四年都出去敲人家門，找人來投票，我們都贏得了勝利。」

一位鐵路查票員說：「現在，杜魯門和民主黨人並不比胡佛、范登堡、塔虎特及其他共和黨人來得好。我要去組織會議，散發小冊子，演講，正像我先前替羅斯福工作時一樣。如果新黨能獲得鐵道工人的堅強支持，那麼，反動落後的勢力，將在選舉日被削弱，也將變得聰明些。」

一位來自肯塔坎的木工，十五年來一直領導着他的工會，他寫信說，他一定擁護我，不論我以什麼身份競選。他說有錢集團將反對我到底，但是，這並不能欺騙工人。

明尼蘇達的一位主婦寫道：「就在你發表演說的那天，我們才向雜貨店老闆借了五元錢替我那生着重病的孩子買藥吃。我的丈夫幾已神經錯亂了，我自己心情也已破碎，那是由於極端困苦的生活所造成的，一間小小的房間，沒有洗澡設備，沒有水流，老鼠還跑出來咬那睡着的孩子。對於我們這些以半工半讀而受到大學教育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在不景氣的陰雲籠罩着我們的家庭及將來的時候成長

起來的人，美國對我們未來的日子，並沒有給予絲毫保障與希望。諸如電影一類的最起碼的娛樂，對我們也已成爲奢侈，因爲我們還沒有足夠的錢去買衣服鞋襪，而且，我們還得一件復一件地把生活必需品項目從我們的採購單上剔除。我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我們要幫助你！讓我們在一九四九年有一個「超新政！」信寫到這裏，她丈夫從外面回來了，就在她信上接下去寫道：「我剛從工會的一次會議中回來，在廚房的桌子上發現到我妻子的這封信。請相信：她所說的一切，我都完全同意。至於我自己，我是一個下層的工會份子。我怕有些蠢然思動的人，正想在希臘或意大利貿然發動戰爭。近來我真沒有辦法把我的賬單付清。我憎恨那對我們人權自由的侵犯蹂躪。」

一位教師從紐約州的一座小村寫信來說：「作爲一個卑微的教師，我願爲你的運動獻金，並志願效勞出力，如果你能發表下面這些意見的話：美國的公立學校制度，必須予以加強及保護，因爲那是團結人民而非分裂人民的工具之一。不要再把萬千錢財用於征兵，應把聯邦的錢財用到公立學校去。如果我們繼續征兵，那麼我們孩子們離開學校後的唯一前途，就是行伍生活及軍國主義。聯邦的資助是重要的，但是要記得當立法機構在向富人集團靈忠的時候，聯邦的資助是錯誤的。我們不准有容許教育經費作不公平分配的荒謬立法。我們不許少數派的宗教團體來接收我們的學校。」

米蘇里小城的一位先生敦促修改憲法以防制將公款用於支持宗派主義的機構。他又進一步指出美國人民的思想，正處於我們這一光榮土地的歷史上最最激動的狀態之中。（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新共和」）

# 「新共和」與第三黨

密却爾·史却萊德

「新共和」雜誌發行人 Michael Straight，於一月起繼華萊士之後而自任主編。該刊在史氏主持下，態度及看法雖與華萊士頗多出入，但大體上與其他自由主義者相較——如「民族」之克却威，下午報之勒納等——則顯與華萊士更為接近。本文為華萊士宣佈競選後，該刊第一次正式表明態度之社論。文中並未正面提及對第三黨運動之贊成或反對，但至少已承認其為一既成事實，並願助其獲致較佳後果，而不若其他自由份子之一味攻訐誣蔑并誇大第三黨運動之惡果，而根本忽略此種攻擊對原可順利進行之第三黨運動所發生的阻礙及破壞。

今天，在左翼方面正有着二條線的政治行動：一個是第三黨的運動，另一個是職工會方面所展開的選舉自由主義議員的運動，這二種運動之間的關係如何，將決定一九四八年究竟是美國自由主義者成功的一年，抑是大失敗的一年。

不論自由份子說它肇源何處，第三黨的運動，已經是在進行之中了。把這一運動指斥為是共產黨所發動的，那就是攻擊說非共產黨的左翼份子，絕對無能於組織一個政治行動。而如果把它指斥為分裂了進步力量，那就是忘却了一個事實：除了極少數人之外，美國人民是向來祇關心於問題 (Issues) 的本身，而不太關心於組織關係的。而在今後的幾個月之中，亨利·華萊士將指出最嚴重的問題，

並表達出重要的真理。

恍惚於最表面的問題，而忽略了內在的真理，實是美國政治上的一個老毛病，也是今日美國左翼力量所以薄弱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遠矚到一九四八年之後，那我們必須承認今日的二次政黨，在機構上都已千瘡百孔，而在其上層控制者方面更是缺乏理想而極其保守。今天華萊士所提出的對二次黨的一切指責，曾不止一次地為歐金尼·台勃斯(Eugene Debs)魯勃脫·拉福萊德(Robert La Follette)和諾曼·湯姆斯(Norman Thomas)等先進，用同樣的詞句提出過。誠如華萊士在「第三黨與美國傳統」一文中所指出的，第三黨是美國傳統的一部份。

但是，第三黨的壽命，很少有延長到一次或二次競選以上的。其基本的原因，即在於缺乏一個合適的社會基礎。

五十多年以來，有組織的勞工，就一直被認為是工業社會中的進步運動之唯一可能基礎。而今日的第三黨却並不依從這一傳統，由於目前的異乎尋常的緊急狀態，華萊士乃以「和平」作為第三黨存在的理由。對於「和平」這一問題，一般人民却與勞工有其同樣的關切，而不是一個專屬於勞工的問題。事實上，華萊士的方案，對於中產階級的清教徒的良知，較諸對於含有強烈的天主教成份的CIO(產業組織大會)，有其更大的號召力。但是，如果這一次運動的目的，是爲了組成第三黨而不僅是爲了「第三張選票」，那末在有組織的勞工中缺乏基礎，才是一大弱點。

職工會的選舉自由主義議會的運動，在今年第一次賦有最深長的意義。

諾曼·麥坎尼次在「一個成功的第三黨」一文●中指出，祇有當反勞工的立法，迫使職工會採取政治行動的時候，才使英國工黨之正式產生成為可能。塔虎特——哈特萊法案之能發生同樣作用，則是很明顯的。

對於職工會說來，拒絕這一法案，已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依持於議會，也同樣依持於總統。如果一個自由主義的議會在一九四九年時通過了一個新的勞工法，它就能使塔虎特——哈特萊法案歸於失效，恰像這一法律會使威格納法案部份失效一樣。對於這，一個單純的多數即已足夠。但如果結局是一個友善的議會和一個非友善的總統的話，那末他可否決新法案而使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繼續生效；這樣，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方可濟事。

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四八年應該是勞工之真正的、有力的政治行動之開始點的理由。

在這一行動中，鐵道兄弟們可以發生重要作用，儘管今日有特殊的立法在管理着他們，他們依然受到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的嚴重打擊。他們的努力是富有意義的，因為在若干頗少有組織的勞工力量的州區內，他們的勢力却是強大的。

在建立最基層的地方組織上，CIO—PAC（產業組織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曾經是而且仍然能够是一支最活躍的力量。

AFL（美國勞工聯合會）還是依照着薩茂爾·江伯（Samuel Gompes）的「獎友懲敵」的老規則而進行工作的。在過去，這一規則的意義，就是發表一長串為他們所認可的名單，而後就把它

拋諸九霄天外。現在 A F L 的勞工政治教育同盟 (Labor 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則正在計劃一個真正的運動。它的全國行政委員會，其中包括着所有國際職工會的代表，將通過州委員會及城市委員會一直到城鎮地區廣泛地展開工作。對於 A F L，政治教育同盟遠不止是一個單純的爭取選票的運動。「我一生都信仰着勞工運動的無黨派政策，」唐·吐賓 (Dan Tobin) 在創立「政治教育同盟」的那次大會上說：「可是無黨派政策多少帶有滑稽戲的性質。」他贊譽英國工黨，視之為一個模範。而政治教育同盟更受到指示應就下列問題展開運動：「高物價、居住、衛生、工資及工時立法，公司控制之成長，獨佔資本納稅，以及其他各種應受國內勞工密切注意的問題。」

這些組織必須在一九四八年克服其古舊的怨恨，而密切合作。可是，它與第三黨之間的差異是異常明顯的。在這些組織中，勞工基礎是極其可靠的，但是，它就缺乏獲得獨立階層之支持的項目。激起這一次運動的立法案，對於勞工是異常重要的，但對於勞工以外的集團，却並無關係，這些集團且認為與工會合作反較與大黨合作更來得困難。

素以氣量極端偏狹著稱的 A F L，其「政治教育同盟」的規章中訂明了：與「非共產黨的自由主義組織」結成「合作的聯盟」。若干 A F L 的領袖，諸如威斯康辛州聯合會的主席喬治·海勃曼等等，正在把「政治教育同盟」與當地的合作社，農民聯盟等團體結合一起，但弱點依然存在。

第三黨運動與職工會的運動，同是進步運動中的一部份。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華萊士所喊出的真理不應該被輕視漠視，而勞工也該懷着必勝信念來從事這次運動。

今天最深沉的危機是：一九四八年的鬥爭，將不是國際主義之反對帝國主義，或是左派之反對右派，而是進步份子自己反對自己。在紐約，如果民主黨候選人不能得到勞工的支持，那末對獨立競選的敦促，將愈趨強烈。在明尼蘇達與加利福尼亞，爭取民主黨機構控制權的熱烈戰爭，正在形成中。在依利諾，一位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保羅·陶格拉斯，正在與芝加哥論壇報的俘虜，現任參議員威倫特·布羅克相競爭，第三黨候選人也是可能提出的。在華盛頓，自由份子如果能得到聯合支持的話，是可能成功的。在所有上述地方，分裂都將引向失敗。

在工會內，CIO-PAAC將繼美國工黨之後而分裂，並將在高級領袖與支持第三黨的工會職員之間展開鬥爭。如果這些分裂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的話，是能够迅予彌補的，如果分裂加深的話，將繼續到幾年之久。

多放進容忍與智慧，這將是偉大的一年。

這必須，第一應承認一個自由主義的議會是最最重要的。

其二，必須同意於什麼才是評定自由主義候選人的標準。據職工會的標準他們斥責了三百七十四名在職議員，因為他們投票贊成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就國內政治而言，這是個公平的標準。但是，那投票反對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的一百另四名參眾議員，却投票贊成援助希臘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如果以這種投票，或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對與否，來作為第三黨支持的標準，那末對候選人的協議將成爲不可能。華萊士曾提到以不久之後對「普遍軍訓法案」的投票紀錄來作為標準。



第三，是必須合作去發掘正直的候選人。自由份子及勞工未能聯合努力於提出正直的候選人，也許是他們最可怕的弱點。現在，在加利福尼亞，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正號召所有的進步份子來參加候選人的選擇。以這種方式，進步份子之間的爭執，可減少到最小限度。

進步份子對於總統候選人之協議，似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第三黨還沒有正式出現，也沒有已知的共和黨及民主黨候選人作為抉擇的對象。以今日參議院之反叛以及海軍之出發前往希臘，我們實無法在一月份的今天，預測到十一月二日時獨立選票將如何形成。但無論如何，對於總統候選人之意見分歧，不應毀壞其他方面的團結。今天的一個粗定的規則是：凡是在總統候選人以外，足以分裂進步力量的一切行動，必須避免。雖然這一條線的行動不能在一九四八年作水乳之交溶，至少也該並行不悖而殊途同歸。（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新共和」）

（註一）Norman MacKenzie，是英國「新政治家與國家」的編者，「A Successful Third Party」一文與本文同時發表於一月九日「新共和」該文係敘述英國工黨成長之經過。

## 華萊士：預言家？政治家？

克却威

這是「民族」周刊主編 Freda Kirchwey 以社論形式發表的反第三黨的文字，在這裏可以看出美國若干「自由主義者」是基於怎樣的理由來反對這一進步的人民運動的。

自從亨利·華萊士宣佈準備以第三黨的身份出而競選總統以來，還沒有發生任何事實，足令「民族」雜誌改變它固有的看法，即認為這一動作，在策略上言是不智的。如果華萊士運動的力量是強大的，那末他將很可能把一個反動的共和黨人送進白宮，并把若干進步份子驅出議會，而如果他表現得極其可憐，那末，還無異向美國以及全世界表示了美國進步力量是何等衰弱，這是不幸的，而在某些方面言，那更是并不正確的；因為數百萬進步份子將決定不為亨利·華萊士而「站立起來做一個人」。

「民族」雜誌仍然堅信不得到勞工的有力支持而展開第三黨運動，是愚笨的；而大多數大工會以及它們領袖們之拒絕支持這一運動，反映出某種較諸「選擇小害」的政治便宜主義更為深遠而較少被認識的要求。美國的第三黨運動，在傳統上向來是由於為大多數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經濟緊張及經濟混亂而出現的。今天確有不正常狀態存在着，也確如華萊士所指出的，美國人感覺到不安與不安全，他們意識到危險就在前面；但同時，產業工人却還有工作可做，還有錢可用，而農民們更是較他們過

去任何時期更來得富有；即使通貨的膨脹，迄今爲止，除了激起新的工資要求以趕上或追趕物價的上漲之外，還沒產生進一步的影響。面對着這些基本的障礙而發動一個抗議的政黨，那就是蔑視一切有關策略時機之規箴，更是把一個人的政治運動，預先交給了另一個政治勢力，而這個政治勢力的最終決定權却操於與華萊士的「普通人民」之需要根本無關的集團之手。——在目前這一問題上，這就是指共產黨。

所有這些，在華萊士宣佈他的意念并提出他的政綱之前，就已異常明顯。但是他上星期的聲明却值得就它們本身來加以檢討。首先，它們指出了華萊士已認識到他前面所存在的障礙。他知道目前并不是發動新政黨的好時機，可是他把那些因這種考慮而暫停行動的人，斥爲「冷血的自由主義者」，而全然不顧到就在不多幾個月之前，他自己還在爲反對第三黨而辯護的事實。他指出他曾竭盡最大努力以促使民主黨致力於和平及繁榮，而由於它拒絕了他的敦促，他乃被迫採取一條新的道路。

「當老的政黨已經從根腐敗了，人民就有權利經由一個新的政黨來喊出他們的聲音。」

基甸的軍隊是小的、是勇敢的、同時也祇持智慧及發聲的器具爲武裝，在這些方面，確實是與華萊士的那隊擁護者完全相同的。但是，基甸擊敗了敵人，而且統治了四十年；就在這裏，存在着這二位領袖之間的差異。我這樣說，並不是含着惡意的。華萊士先生雖然選擇了這樣一個聖經故事爲例子，他自己也知道他並不能擊敗二大政黨。但是在進步份子方面，重要的是應該了解他究竟爲什麼要

作這樣的嚐試。

對於這位未來第三黨的領袖，與其視之為政治家，還不是稱之為預言家。人們儘管可以不同意他或是反對他；人們也儘管可以說一個祇對自己的內心衝動負責，而不對朋友們的實際忠告負責的人是不適宜於搞政治的。可是，人們就不能毫不自損其尊嚴地懷疑他對於目的或是他所認定的那種進步道路的獻身精神，因為華萊士必須站立出來宣告他的和平及民主的理想，不論時機之來到與否。如果他的新政黨竟然幫助了或是安耐了反動份子，或者是變成了共產黨的工具，或者是迷惑了或削弱了進步力量，無疑的，這會使華萊士感到遺憾與歉仄的；可是如果反過來，而對着像當前局勢那樣的可怕挑戰，他祇是靜坐一傍默不作聲，而不能向人民說出他的信仰的話，那末這將表示了他的懦弱。至於共產黨人，究竟他們也是人，而如果他們自願支持一個為和平為更好的世界秩序的運動的話，試問，誰又能拒絕他們呢？

華萊士對杜魯門政權之廣泛指摘是正確的。我相信大多數的進步份子，都將對他的大部份批評表示同意。但在把他的原則性的批評作具體的應用時，才發生了差異，這種差異大得足夠阻礙他的第三黨運動。

當然，他的這些批評都是正確的：在目前政權下，通貨膨脹已蠶食了人民的生活水準，獨佔資本對於工業的控制業已加強，軍事勢力在政府中已有大量增加，而最重要的是：外交政策已日益趨於反動。他指摘馬歇爾計劃繞過了聯合國並且尖銳化了東西歐的分裂，這在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但是就是

在這最重要的一點上，華萊士的普遍指摘，在精細的檢查下站立不住了。

且讓我們看一下華萊士對馬歇爾計劃所作的批評——馬歇爾計劃是當今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心，因而也成爲華萊士攻擊的重心。

我反對今日在實踐中的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因爲它們把歐洲分裂爲二個鬥爭的集團。那些通過糧食的政治交易而被我們收買過來的人，不久就將背叛我們。他們先將報我們以廉價的暫時感激，然後又轉而憎恨我們，因爲我們的政策，燬壞着他們的自由。

我們經由美國自己的機構而非聯合國的機構，去重建西歐和德國，目的祇是包圍蘇聯。我們的行動，恰如英法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所採取的行動，其結果也將是相同的——迷惑混亂以及戰爭。

當馬歇爾同意於——雖然是稍遲了些——應把蘇聯邀來參加巴黎會議的時候，他終於放棄了——如果他先前會如此主張的話——把東歐擯除在美國援助之外，或是包圍蘇聯的思想。那是莫洛托夫，當他步出巴黎會議之時，他決定了東歐應該包括在外。爲什麼他要如此呢？是爲了馬歇爾——經由美國機構而非聯合國機構——以活動嗎？我不相信如此。很明顯的，從一開始起，馬歇爾就沒有通過聯合國以從事這項工作的意思。「民族」雜誌早就指出這一點而加以批評。對於這一點，在莫洛托夫出發來到巴黎之前他就已是明白了的。我想蘇聯之退出，是因爲下列二事已日益明顯：一、美國已決定恢復

德國的工業生產，而全然不顧蘇聯的願望或是波次坦協定；二、馬歇爾計劃一旦成功，將大大削弱蘇聯在整個歐洲的勢力。因之，對於歐洲之分裂為「二個鬥爭的集團」，莫洛托夫的决定，至少已把蘇聯構成爲一個共同犯，而華萊士却把歐洲之分裂，單單歸咎於馬歇爾計劃。

華萊士在密爾華基所提出的一個替代方案<sup>①</sup>，是一個豪爽慷慨的理想。他要取消馬歇爾計劃，而代之以一個復興基金，由金融上有力量的國家認繳，而由聯合國加以管理，並以一個五年計劃爲基礎，予「在納粹侵略下受害最深的國家」以優先分配；基金中沒有一文錢可以用於軍事目的，而對贈予款項或貸款，都不應附以任何政治的或軍事的條件。這一建議回歸了建立「聯總」的那些崇高原則，它也接受了「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的論點。但事實已使這一方案成爲政治上的幻想。它的唯一後果——如果它竟能有什麼後果的話——便是促成「歐洲復興方案」的失敗，並澈底消滅了所有改進這一方案的殘餘機會。這恰就是共產黨所需要的，也是塔虎特所需要的。但是在歐洲，所有非共產黨的進步份子——像華萊士那樣的人——却需要這一方案得能實踐，他們祇希望美國的進步份子能強大得足夠去阻止削減及附加政治條件。

就是這一希望，削弱了華萊士的總統競選。而第三黨的出現，已經減少了自由份子對政府方案的批評指摘，那些在不久之前，還在指摘着馬歇爾計劃阻撓歐洲的社會進步的人士，現在却已溫和了他的批評，怕的是人家會說他們跟基甸軍隊結成了聯盟。

在我的看法，這將證明是華萊士的决定的最嚴重的後果。對於第三黨的創造者及支持者，放棄爲

崇高健全的外交政策的鬥爭實是最致命的了。那些反對華萊士的完備主義，並反對他的運動的進步人士，為他們自己的更為實際的民主方案而鬥爭的義務，已日益增加。他們自己的力量實遠較他們所想像的為強大，因為民主黨唯有藉贏得或保有他們的選票，才能免除華萊士第三黨運動對它所發生的威脅。（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民族」周刊）

（註一）Gideon's Army，聖經故事之一，基甸是以色列的英雄，曾經擊敗米甸人（Midianites）。舊約「士師記」第六章。

（註二）見本書「我的世界復興計劃」。

按：「民族」週刊自發表本文之後，其讀者紛紛投函反對，並表示惋惜，（一部份投書揭載於二月十四日該刊，）二月二十一日該刊又刊社論一篇，以為答覆，該文仍堅持原來反對立場，並強調其反對理由，係在於第三黨運動足以威脅馬歇爾計劃及以後的援助計劃。但對於總統競選，則不若其他「自由份子」之以為非杜魯門莫屬，而指出：「我們可找到遠優於杜魯門的民主黨人，同時，我們仍然由衷地歡迎華萊士把他們的勢力，轉用到民主黨的提名大會上來」。隨同民主黨南方反對派之公開叛變，杜魯門之聲望已日益降低，克却威復於三月十三日該刊發表社論：「向華萊士先生進一言」，正式提出了請華萊士為民主黨候選人的要求，希望華萊士主動地領導進步力量來改造民主黨。該文一再指出「今天所特別需要的，是獨立左派各分子之間的重新團結，而不是自相敵對。」更強調對杜魯門之改造已「為時太晚。」

## 競選與冷戰

美國自由主義報紙「下午報」總主筆勒納 (Max Lerner)，是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的。除了零碎篇章外，他更自一月二十五日起在「下午報」上連續發表了九篇文章，分析競選局勢，本文便是其中的第六篇。他把民主黨之必然失敗，孤立主義之可能抬頭等一切惡果全都歸咎於第三黨運動，並指出第三黨無助於和平，無助於促成自由主義的議會，無助於奠定進步黨的基礎。他以極肯定之語氣，斷定華萊士競選之必敗，以及第三黨運動之百無一是。至於他所持的理由，可自本文中窺見一斑。

不論競選的主要論題將是什麼，毫無疑問地，選舉中的最大賭注將是戰爭或和平。華萊士集團所說的關於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話，是否是對的呢？——他們說民主共和兩黨都是好戰的政黨，是半斤八兩的一丘之貉；而爭取和平的真正動作，就是在於給予美國人民以經由第三黨而投票選擇和平的機會。

無論如何，華萊士總是基於這一命題，而建築起他自己競選總統之決定的。對於每一種指出第三黨運動之錯誤的辯詞——指出它將促成一個反動的共和黨總統及議會之登台——華萊士的答覆總是：「主題是和平與戰爭。二大政黨都是戰爭的政黨。美國人民必須被給予機會，以為和平而挺立起來作



一個人。」

我確信華萊士對於這是真誠的，他深深地渴望和平；我也確信美國有少數人將給他以反響。當我在過去幾月中旅行全國時，我所得到的最深切的印象是：告訴我他們之恐懼並深痛惡絕於那些美蘇之戰無可避免的談論的人民，其人數竟是如此衆多，而且都是簡單的人民，保守的人民。當華萊士在無線電中發表演說初次展開他的競選時，他就是試向這些人民呼籲的。在這一演詞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勞工及工業國有。這並不是他後來在芝加哥大會中所發表的那種「進步公民協會」式的演說。那是一篇向那些給「冷戰」以及有關「熱戰」的謠傳嚇怕了的人民發表的演說。

這些人民是否會投票選舉華萊士呢？我相信其中大多數是會投票選他的，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跟他們的接觸，如果他他不切斷他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果他試想團結全美國進步運動的整個廣泛陣營，而不是僅僅團結其中的一部份的話。而由於事實剛與這些條件相反，我相信大多數人民，已因自麥迪遜廣場演講以來對華萊士的一連串的攻击，而給嚇退了。應該記住的一件事是：美國人是愛好美德的，但是祇有當美德最被尊重的時候，他們才愛之最切。美國文化的標準化的力量，是如此其強大，致令美國自由主義也必須至少具備了一部份可尊性，方能行之有效；羅斯福的主義是具有可尊性的，而在華萊士容許他自己被孤立起來之前，他也是具備的；而現在，他與共產黨人的聯盟，則已完成了他的孤立。作為結果的是：許多原來熱望為和平而「站起來作一個人」的美國人民，現在却遲疑起來了。

美國人民已不再願意被加上烙印。不論你喜歡不喜歡，這可就是美國人頭腦的本性；其結果是：投票要求和平的，原來應該佔大多數，却將證明是小小的少數派，——這少數派就遠不足以真實地表達出美國人民之壓倒一切的和平願望。

因此，我深恐華萊士自己的目的，是將會失敗的。相反於充分表達美國的和平意願的，他所能得到的，將不會超過全部選票的十分之一，甚至將遠少於這一數目。固然我也相信華萊士能够使若干原來不準備出來投票的人參加投票，但它在全部選票中所佔的比數，仍是微乎其微的。華萊士自己，當然無望當選總統而實踐其優美的政策；而如果一個共和黨人被選上了——那是極其可能的——那麼新政府將把這一選舉勝利，視作爲美國人民已像擯斥杜魯門政策一樣地擯斥了華萊士政策——證明這將是個向右的急轉，這決不能解釋爲轉向對蘇和平；如果杜魯門重獲當選，——這在今天似乎已無希望，但仍有其可能——那他就會把它視作爲人民要他去執行其「冷戰」政策的更新了的委託，他更將雀躍於華萊士之遭擯斥。無論在那種情形下，我絲毫看不出華萊士或和平可算作爲得勝者。因此整個第三黨運動，雖然是作爲爭和平的運動，却在其本質上就註定要遭受嚴重失敗的。

但所有這些，我還祇是就第三黨運動之目的表面價值而言。對於這些目的，我確信華萊士是深信着它們的，而它們也支配着他的行動。可是，我也同樣確信着，那些作爲第三黨運動的基本推動者

之一份子的共產黨人，却並不相信它們。固然他們也是需要和平的，但他們並不相信單單由那效力微弱的少數派，作出「挺立起來作一個人」的行動就可以得到和平。共產黨人，不論他們究竟還有些什麼性質，却並沒有盲目無知的特性；他們都是實際主義者，他們並不喜歡玩弄政治姿態；他們是為佔有而行動的。對於「挺立起來作一個人」的少數派行動的姿態，以及堅實的實際結果，他們對前者的興趣，遠不及對後者那樣的強烈。如果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的教訓還有什麼意義的話，它的意義就在於卑視姿態。姿態的力量——是道德姿態而非別的姿態——是屬於泰洛、托爾斯泰和甘地的，而不是屬於共產黨人的。他們不需要姿態，而祇需要結果。而由於事實的演變至為迅速，結果也該趕快來到——而不是在遙遠的將來。

繁繞在共產黨人的頭腦中的實際結果是：

給予杜魯門以沉重致命的痛擊。

選出一個共和黨的反動份子。

如果可能，則選出一個孤立主義者，如塔虎特那樣的。

選出一個共和黨反動派的——如果可能，則是個孤立主義的議會。

從他們的觀點來看，第三黨運動是走向他們心目中的和平的一大勝利。因為，一個在杜威（我們且這樣說）主持下的反動的共和黨政權，將（用他們的話來說）撕掉馬歇爾計劃的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面紗。而如果勝利屬於塔虎特或是麥克阿瑟那樣的孤立主義者，那末馬歇爾計劃將全面結束。再者，

如果一個共和黨政權將引致美國國內經濟的大恐慌，這將必然結束對歐洲的爭奪。

簡單地說，共產黨也是需要和平的。可是，在華萊士是想藉「挺立起來作一個人」而獲致和平，在共產黨則希望實際地由美國之放棄歐洲爭奪而贏得和平。在杜魯門是希望由馬歇爾計劃之對蘇贏得無條件勝利以結束冷戰而獲致和平，在共產黨則希望以蘇聯對馬歇爾計劃之無條件勝利來結束冷戰而獲得和平。這些就是此次競選中和平與戰爭以及冷戰的最大賭注。而根據今天的事實來看，那些想藉結束冷戰「階段」而獲得和平的人，其前途實是毫無希望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相信，我們要想以結束冷戰來獲致和平，既不能以美國之無條件勝利為條件，也不能以蘇聯之無條件勝利為條件，而必需通過全面的諒解讓步，以及白紙黑字的協定。

我還沒有說到共和黨是希望怎樣來獲得和平的。他們中有些人是經由二黨外交而和杜魯門站在一起；另有些則把歐洲當作老鼠洞而主張「歐洲事管他娘」，還是埋頭建立起美國的軍事威力；另有些人——這些都是在大企業和新聞紙系統的首腦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共和黨人——則認為杜魯門的冷戰，實是個無稽的夢想，主張着問題祇有藉「熱戰」來解決，熱戰的「熱」，則由原子彈來供給。由於第三黨運動之足以助成這一種共和黨人之當選，它將證明是華萊士自己理想的希望之悲劇性的失敗。而即使是實際主義的共產黨人，也將咎由自取地得不償失。

左翼方面——在共產黨人同時也在非共產黨的進步人士——還有另一種意見，那是因迷惑於塔虎特的可能勝利及其後果而發生的。誠如我所指出過的，他們對塔虎特的孤立主義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他們似乎不明白的是：當一個孤立主義獲選當權之後，他就會變成一個反動的軍事主義者。塔虎特已經建議過以增強美國空軍的力量，來替代普過軍訓案。而如果軍事孤立主義的政策，將引致共產黨在歐洲的勝利，那末，幾乎可以斷定說，軍事孤立主義終將轉變為軍事干涉主義。到時候，杜魯門主義又將報復地重行替代馬歇爾計劃，而把對希臘的手術，擴大到應用於整個歐洲。

也是這一部份的左翼意見，他們相信像塔虎特那樣的反控制的死硬派，將把美國引入像在胡佛治下發生過的那樣大恐慌。我相信他們的看法是對的，而他們的錯誤則在於把這種經濟恐慌認作爲意味着和平。如果我們有了一千五百萬的失業者，那就祇有二個辦法使他們重新回到工作裏去：其一新政，像羅斯福執行過的那樣，但共和黨人是極不像會給我們一個羅斯福新政的；而另一條解救途徑就是戰爭。當另一次共和黨的經濟危險發生於世界局勢更形尖銳的時候，那才是原子戰爭的真正危險關頭。這似乎會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間任何一個時間內發生。（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下午報）

## 後 記

清樣校畢，意猶未盡，覺得有幾點還需要在這裏說明的。

華萊士與第三黨運動在日漸壯大中。這枝「基甸的軍隊」繼續前進，氣勢莫之能禦，美國的反動派竟已採用流氓打手的慣技來和他廝拚。這固然說明了美國在加速走向法西斯化，同時也襯出第三黨運動的成就偉大，反動派吃驚非凡。祇要美國進步人民勇往直前，一無所懼。必能有令人滿意的前程。

在讀本小書裏，我們只提供對於美國大選及第三黨運動的一個基本的看法和一些權威性的論文。由於篇幅的限制，在創作方面（慕松執筆），沒有對兩個舊黨的個別候選人作相當的評介；在譯文方面（植東執筆），除去華萊士的論文以外，只選譯了極富代表性的諸家反對意見。

目前，民主黨跌入極大的苦惱。據民意測驗的結果，杜魯門失盡人心；但是除了杜魯門以外，尙未找到較為合宜的人來。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文生諸人，都還是二流角色。共和黨內競選鬥爭十分猛烈。杜威、史塔森、麥克阿瑟、范登堡、塔虎脫，誰能担当正式候選人，各州的預選會尙無明晰的結果。史塔森壓倒麥克阿瑟，以所謂「自由主義」的面貌引人；杜威塔虎脫旗鼓相當，難分勝負；范登堡如果當選候選人，那實在是一匹「黑馬」(Black Horse)。這些人以外有個艾森豪威爾，他曾拒絕

担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民主黨對他尚未絕望。正如貝柏所說：「他或許已把門兒關得緊了一點；但我仍未聽到落鎖的聲音」。他依舊是美國一個存在的政治勢力。艾森豪威爾這個人，令我們奇怪的，究竟屬於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竟無人關心，而他自己也沒有聲明站在何種立場。這樣一個被兩黨拉攏的人，就雄辯地駁倒了許多所謂「自由主義者」，他們硬說兩個舊黨存在着巨大的差別呢？

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兩害相權取其輕」(Lesser of the evils)的政策是極其有害的。民族雜誌編者克却威一直沒有改變反對第三黨的立場，不過在本書選擇的那篇文章發表以後，他在答覆讀者責難的信函中，語氣頗為婉轉。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該刊上，希望華萊士自己發動重回民主黨，改組政治陣線。這意見，我們有過批評，不必多贅。值得注意的是，把華萊士只看作「預言家」的克却威，他已肯定華萊士有偉大的使命，「在進步力量中太重要了」。下午報的勸納以平時「前進」的名氣做資本，大肆抨擊第三黨運動。讀者們回答他的是立刻跌了四萬份報！事實是頂好的教訓，他在萬千人支持華萊士的形勢下，顯然緩和了積極反對的態度，雖然並沒有改變他的立場。從反面看來，這還不足够證明華萊士力量在成長，聲望在增高嗎？第三黨事實上是第二黨，兩個老黨都是一流貨。現在的問題不是華萊士重回民主黨去，而是民主黨內開明進步的黨員及擁護民主黨的選民將大量轉移到華萊士這方面來。三月十三日民族雜誌上克雷姆 (Dale Kramer) 一文不就指出民主黨內反叛日增麼？反動派愈叫囂戰爭，將有更多的人投票擁護和平。我們等着瞧吧。

曾任「新共和」高級編輯的海爾 (W. H. Hale) 在四月份「哈普」(Harper's) 雜誌上發表：

文，竟指華萊士是一個胸襟狹隘而野心很大的人，認爲他宣布參加競選顯然爲了對杜魯門把他趕出白宮的一種報復。這論調不僅對華萊士的純正動機是一種曲解，而且也是對美國進步人民的一種污辱。難道萬千爭取民主和平的大衆，竟還是爲一二人意氣所指使的工具！海爾的文章反而證明了華萊士不僅是理想主義者，而且是受大衆擁戴的和平鬥士。他決心推展第三黨運動是經過慎重考慮的。

還有「工人日報」上史塔羅賓（Joseph Starobin）批評勒納反對第三黨的論文，以及三月份「羣衆與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上赫伯特·厄伯斯克論自由主義者的文章，都沒有選擇。

限於篇幅，所有這些只好割愛了。

我們應該在這裏申謝的：余孟如先生會熱忱地借給我們一束有關的材料；王李二兄爲這本小書精心設計封面；尤其是呂鍾兄，沒有他的力量就沒有這本小書。末了，如果讀者在這本小書裏還看出華萊士與第三黨運動的全貌，我們也是感謝的。

編譯者一九四八年五一節



